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

A Tea Story in an Indigenous Village :

Tea Production and Indigeneity in Lishan

賴思妤

Szu-Yu L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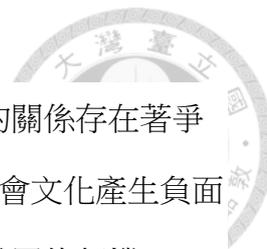
指導教授：洪伯邑 博士

Advisor: Po-Yi Hu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uary, 2017

摘要



隨著另類食物生產和消費的發展，現金作物和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存在著爭議。過去的研究認為，外來的現金作物的種植，可能對部落的社會文化產生負面影響。然而，在外來經濟作物引入的同時，是否也提供原住民發展的契機。

在本研究中，我以高山茶這項原本不屬於原住民的傳統作物為媒介，討論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並分析其如何藉由產茶與賣茶的過程凸顯原住民性。藉由政治生態學對原住民性的討論，打破當前社會對原住民浪漫化的想像，以貼近接合在不同情境中動態的原住民性。

在方法論上，我以梨山新佳陽部落為主要的田野點，以半結構式訪談和參與觀察法，考察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日常生活實踐，並追蹤茶葉從產地到市場的生產過程，探究特定情境中原住民性的意涵。

高山農業脈絡下的原鄉茶產業發展，涉及來自平地茶農、茶商、製茶師和國內外的投資者。在茶葉產銷面上，原住民嘗試以生產論述、包裝和服裝，在不同場合中回應主流對原住民的想像，在跨尺度的空間中不斷地自我定位。

我論證原住民性並不是單純來自族群的差異，而是在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透過茶葉這項經濟作物，形塑出族群的邊界外，跨尺度浮現的原住民性，存在著有別於國家想像的落差。在社會文化面，深化身分認同的同時，個人階級的翻轉也改變部落的社會關係。

原住民性的浮現看似深化了原漢之間的族群邊界，但在多重且複雜的關係中，各自存在著偶發的變動與矛盾。為了補足接合理論，我借用跨地方裝配的概念，說明雖然茶與原住民在不同尺度中，原住民性存在著模糊地帶，卻也因為異質元素的結合，使跨界發展成為可能。最後，本研究藉由原住民性的討論，重新檢視原漢二元對立的思維，以及對原住民政治正確的論述。

關鍵字：高山農業 梨山 原住民性 高山茶 接合 跨地方裝配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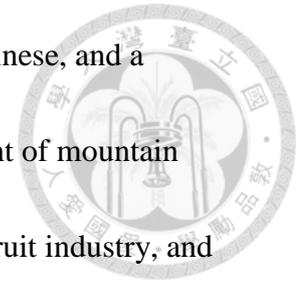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h crop planta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 is contested within recent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ny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when indigenous people planted foreign commodity crops, it caused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s on the tribe. However, some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new cultivation of the foreign economic crops also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his study, I used tea, which is seldom seen as par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raditional culture, to discuss the dynamics among tea, mountain agriculture, and an indigenous group called Atayal in Lishan, Taiwan. I aim to identify how the indigenous people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changing tea market and tea production by studying their multip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tea farmers, tea merchants, tea maker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ors.

Drawing primarily up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with the indigenous tea farmer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this research enquires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indigeneity of tea industry.

Tea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Han Chinese, and a represent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the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gradually replaced the fruit industry, and became one of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My analytic approach is based on political ecologist understanding of indigeneity with the concept of articulation. Through my analysis, the indigenous people have been in struggles ove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 the state, rec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indigeneity have been embodied and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tea industry.

I argue that indigeneity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ethnicity,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addition, indigeneity that emerged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articulation of indigeneity also deepen the identity, while changing the clas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ribal.

By viewing tea on the economic crop, the boundaries of ethnic groups are formed by the market.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eity seems to reinforce the ethn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Nevertheless,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eity has been in fact simultaneously existed with contradictories. It shows a process of translocal assemblage, and illustrates the limitations of articulation.

Although the ambiguities of indigeneity exist between tea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t different scales, cross-border work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 make it possible to develop tea industry.

For those indigenous people who practice mountain agriculture for their livelihoods in my study, the process of value cre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paradoxically, has also strengthene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ecognition of land in the tea marketi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indigeneity,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an essentialized indigenous culture should be re-examined.

Keywords: mountain agriculture, Lishan, indigeneity, high mountain tea, articulation, translocal assemblag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發問.....	1
第二節 文獻與理論對話.....	3
一、台灣高山農業與原住民相關研究.....	4
二、原住民性.....	8
三、原住民性與政治生態學的互補.....	11
四、原住民性作為分析的概念.....	16
第二章 研究設計.....	21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區選定.....	2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8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30
第三章 茶葉到原鄉.....	32
第一節 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	32
第二節 茶葉上高山.....	38
第三節 動態混雜：有別於國家理解的高山農業.....	44
第四章 製造「自然」：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	45
第一節 原漢合作的茶產業：土地、技術與資本.....	46
第二節 何謂「原味」：原住民在茶園管理的實踐.....	56
第三節 跨界嘗試的滋味.....	62
第五章 原住民性的浮現：原住民性對外展演與認同的凝聚.....	64
第一節 全球化下台灣茶產業的挑戰.....	65
第二節 再現的原住民性：茶葉通路的契機.....	71
第三節 「原」來不簡單：對外與對內的矛盾.....	83
第六章 結論.....	84
引用文獻.....	89

圖目錄

圖 1 梨山、新佳陽、霧社、廬山位置圖.....	2122
圖 2&圖 3 產品包裝分別獲得2014年德國IF 包裝設計大獎,以及2015年OTOP 設計獎.....	70
圖 4 台北食品展上茶葉包裝呈現出自然,與產地連結的意象.....	70
圖 5 在原住民觀光元年成果展會場中,原住民茶農與外國觀光客的茶席互動.	73
圖 6 2015 台北食品展原住民高山茶攤位的展示.....	77
圖 7 市長在梨山茶產地認證記者會與梨山茶農、泰雅族人合影.....	81

表目錄

表 1 受訪者列表.....	26
表 2 梨山茶區採茶、製茶成本比較.....	5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發問



在台灣，我們對原住民的印象，不外乎是小米、或是豐年祭等刻板印象，然而，茶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則較少被拿來討論。茶在台灣作為一種漢文化的象徵，那麼原住民如何從種茶、賣茶的過程中，重新定位自己身為台灣原住民的身分？

自 1980 年代以來，台灣茶產業面臨的失去外銷市場的危機，同時，原本外銷茶葉的北部茶園，隨著都市化後農業用地的縮減，生產成本的增加，北部茶區逐漸沒落，相對的，茶葉的生產轉往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南部山區發展。在政策上，為了延續台灣茶產業的發展，省政府提倡台灣茶內銷，鼓勵國人喝茶，以支持台灣茶產業。因此，在台灣茶在產地和銷售政策的轉移下，市場上出現了一股提升台灣茶產業的認同，與高山茶海拔愈高愈好的論述（李欣潔等，2014；余寶婷，1997；陳宇翔，2007）。

這股高山茶熱在茶商的炒作下，也擴及到梨山地區。自中橫公路開通後，梨山地區在高山農業的政策下，經營高冷蔬菜，以及溫帶果樹產業，近二十年來開始發展茶產業。由於高山茶的品質好、經濟價值高等因素，受到國內、外茶商的青睞，也吸引不少平地人到山上投資種茶，梨山因而成為全台灣海拔最高的新興茶區。

此外，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原先在山上經營果樹的原住民，在面臨生計調適的狀況下，也開始轉作經濟價值較高的茶樹，為了延續祖先留下的土地，他們試著以自身的力量經營茶園。然而，當平地人大量的投資茶產業，大規模的新闢茶園，將土地作為獲利的工具時，對原先住在中橫公路周圍的原住民族而言，這些土地是他們的「傳統領域」。



在高山茶的銷售上，原住民會將「傳統」的意象添加在茶葉行銷手法中，相對於漢人所生產的茶，甚至成為對外展演認同與本土的一種方式。舉例而言，在茶葉的行銷上，南投縣仁愛鄉農會產銷班的茶道課程上，鼓勵原住民在茶道藝術中加入原住民的元素，增添茶道的多元性，藉此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前來買茶¹。另外，有原住民茶農將茶葉罐印上傳統圖騰包裝，或是貓頭鷹、台灣黑熊、水鹿等圖案²，擷取曾出現在傳統領域的動物，作為原住民茶產業的識別，其代表了「本土」、「自然」和「傳統」的意涵，有別於漢文化茶葉包裝常見的鳥語花香、山水畫的形式。除了原住民茶農以文化包裝的形式，強調「原住民」所生產的茶葉外，地方政府在行銷茶葉作為特色產業時，也將原住民和茶產業兩種不同的元素結合一起，宣傳「原鄉茶葉」的賣點。

在以漢民族組成的主流社會的觀點中，「原鄉」茶葉變成的行銷地方特色的號召，認為「原鄉」就該呈現出代表「原住民」的元素，對「原鄉」存有浪漫化的想像。這樣的想像在台灣強調本土主義時，我們不小心會對「原住民」和「原鄉」產生過度簡化的理解，忽略其真實的複雜性。過去對原住民存有相對傳統、落後或是破壞水土的印象，直到近年在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以及食安議題的延燒，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觀點翻轉為水土保護者，或是具有傳統生態智慧的實踐者，上述相關的說法對原住民存有既定的想像。如此將原住民與自然二元化的思維，將有可能讓原住民在變動的社會中，固守「傳統」的一方因而喪失主體性（陳毅鋒，2009）。

假若沒有進一步的檢視原住民與茶產業之間的關係，類似原漢之間的偏見，以及對「原住民」存有浪漫化的想像，可能會讓原住民再度地陷入困境中。因此，

¹ 南投新聞 高山茶道融入原鄉文化（來源：鑫傳視訊，2016.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lpQlfoa58>）

² 由於茶展的老闆為泰雅族人，其攤位中的擺設的貓頭鷹為泰雅族的報喜靈鳥。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要進一步探究的是原住民在什麼樣的脈絡下浮現，以及其再現傳統的意圖為何？過去的原住民研究中，多以特定的空間和族群為研究對象，多討論部落內部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而較少論及其他影響原住民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因子。相較於平地人，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在生產高山茶的過程中多面臨銷售的困境，以及土地利用和缺乏資本的掙扎，我認為他們並不只是被鑲嵌在資本市場邊緣中的特定族群，而是要檢視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影響原住民所面臨的困境和影響因子。

本研究以梨山新佳陽部落的茶產業發展為例，指出原住民在茶產業日常生活實踐體現的複雜性。在高山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力量的進入對原住民的生計、文化認同產生轉變如何藉由茶這項外來作物的引入，改變了地景和人地之間的關係，更確切的說，本研究主要處理的核心議題為原住民如何藉由種茶、產茶的過程，進一步的重新自我定位，以及討論他們又如何被看待，並藉此打破對原住民既有的想像。

研究發問：

1. 台灣茶從低海拔傳到高海拔原鄉部落的歷程為何？
2. 原住民如何看待高山茶作為新型的經濟作物，並回應新作物帶來生活方式的轉變？
3. 原住民如何透過與外界的協商、調適的過程中，將外界對於原住民的想法，以及自身作為原住民的理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第二節 文獻與理論對話

本研究為了了解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原住民如何藉由高山茶產業的實踐，不斷地與他者進行劃分的過程中，挪用不同的元素或是創造不一樣的論述以

回應主流社會的需求。首先，我將針對高山原住民在農業方面的實踐，理解為何原住民在農業經濟方面的侷限性。接著，以原住民性的概念理解原住民在不同時空、關係中的變動性。最後，我將結合前述兩者討論的侷限性，試著以政治生態學的取徑討論原住民性的可能。



一、台灣高山農業與原住民相關研究

從既有原住民和農業的研究，以及原住民在生計變遷的調適過程的相關研究中，可以從高山農業的脈絡分析山地與平地之間互動性，以理解原住民的生活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回應外部政治社會的運作，同時內部社會也嘗試進行與外界進行調適與妥協。在既有的原住民研究討論經濟社會的變遷時，反映在部落社會變遷、地方文化經濟的建構，以及自然保育與環境治理等面向。（王俊豪，2013；官大偉，2014；曾寶慧，2015；黃應貴，1975；1981；陳茂泰，1973；陳憲明，1984；梁炳琨，2005；紀駿傑 1998；陳毅鋒，2009）

以巨觀的政治經濟脈絡檢視原住民的社會經濟變遷，可以看得出原住民的對政治經濟依賴所產生的困境。黃伯松（2007）以退輔會主導中橫公路的開發歷史為背景，梳理日治時期到戰後梨山地區不同族群在高山農業發展的圖像。其中，梨山原住民在政權的轉移下，成為被支配的群體。此外，廖文生（1984）從長時間的尺度探討台灣山地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並將山地社會的變遷置入台灣在全球的經濟脈絡，以檢視山地經濟變遷的動力來源、過程以及影響。廖認為平地土地改革成功，形成了平地農人上山開墾的推力，衍生出土地商品化的現象，其中，由於山地經濟在山地道路開通之後，便納入台灣經濟發展，形成原住民對平地市場的依賴。然而，原住民在接受資本主義的之後，卻沒有因此而順利地得到發展

帶來的好處，其反而因為金錢觀與平地人不同，以及勞力不足的影響，迫於取得資本的情況下，將土地出租給平地人（廖文生，1984；顏愛靜、楊國柱，2004）。

上述研究個別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切入，點出了原住民在國家力量下，並沒有特別的對外彰顯，而是順服於國家在山地政策的規劃中。以巨觀的角度檢視原住民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困境，但對於原住民在日常生活實踐上，如何回應外部力量所帶來的衝擊則較少討論。外來的政策經濟制度實際上部落的社會經濟影響，在部落中處於一個不斷變動、調適的狀態，因此有學者嘗試以微觀的角度探討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動態變遷。

黃應貴認為為了解原住民生計、文化與市場調適的過程，必須將原住民經濟與社會放在大尺度的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下重新定位的觀點（黃應貴，1975；1981）。戰後，隨著山區道路交通和資訊日益發達，市場經濟的介入，使得原住民的生計、文化與社會面臨劇烈的變化，為了能夠維持生活運作，原住民藉由不斷地回應外界社會的需求，以進行社會文化的調適。例如：商品作物的引進，使得部落的生產型態產生新的轉變。人類學者黃應貴以東埔社的布農族為例，從經濟作物轉變到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的轉變。黃以新物種的引進解釋布農人如何看待新作物方式，例如透過家庭生產單位、教會的體系、部落傳統儀式性的常規，或是原漢經濟合作關係的角度詮釋新的物種（黃應貴，2004；2005）。

此外，隨著資通訊日益發達，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已經產生巨大的改變。例如：個人能動性的提升，打破了既有的生活框架，弱化了原有的部落社會，進而產生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衝突；亦或是過去的社會關係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轉變成階級的關係（黃應貴，2012）。人類學者陳茂泰探討泰雅族如何由原來山田燒墾方式，轉變為到果園的經營。他認為關鍵在於 gaga 這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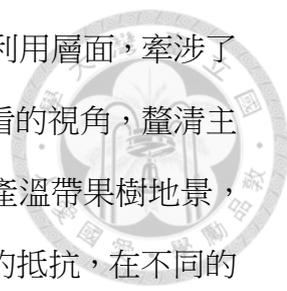


泰雅人的共祭精神是否在轉作的過程中充分的發揮，換句話說，當外部的經濟作物傳入時，部落內部傳統的社會組的運作，具有調節部落生產活動的作用（陳茂泰，1973）。調適的過程除了反映在社會組織的變動外，陳怡萱（2014）進一步地從空間與性別的角度，探討比雅楠部落生活方式從小米轉作到以高麗菜的發展過程中，發現部落空間的變化和性別關係在勞力分工的轉變。那麼，在梨山原住民部落茶產業的生產，部落內部的社會又會調適呢？

上述 4 篇以部落的社群為生活、經濟生產為單位，體現了原住民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如何運用其社會文化的機制，回應外在環境對部落社會的刺激，並進一步反映了原住民如何思考新作物的意義。相較於從巨觀的角度檢視原住民如何在通往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為靜態的弱勢族群，部落社會藉由市場機制的運作，展現了原住民在生計調適上的彈性，同時也展現了原住民社會的多元面貌。

梨山地區為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邊緣地帶，其人口組成和土地利用情形極為破碎且複雜情況下，部落產業的維繫如何藉由部落社群的運作並回應市場經濟，便是一大挑戰。因此，本研究嘗試兼具巨觀與微觀的視角，討論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的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在前述的研究中，除了有部落內部社會對外調適之外，其如何與非原住民的資本家競逐？其實際的行動和策略為何？又反映在哪些生活環節，並使其能夠延續在農業市場和土地利用上保有最後的籌碼？

若從產業發展面進行理解，地理學者陳憲明根據在梨山和霧社的實地調查，認為隨著高山農業發展有成，不少平地果農到山上向原住民租賃土地，同時平地果農也與原住民進行果樹種植技術的交流，使得高山地區的果園經營的生產網絡更為緊密（陳憲明，1984）。在不斷的回應市場、國家的制度的過程中，原住民藉由與漢人在果樹產業的合作，並引進農業知識與技術、產銷組織制度以增進其



在果樹產業的競爭力，此一競爭的結果也反映高山農業的土地利用層面，牽涉了更複雜的環境問題。曾寶慧（2015）進一步以地景理論作為觀看的視角，釐清主流論述對環境保護的觀點下，泰雅果農如何以日常生活實踐生產溫帶果樹地景，以抵抗主流社會對高山環境保護論述。換句話說，原住民隱形的抵抗，在不同的政治經濟位置中，各有其變動的樣貌。

除了在產業面上的發展時而受到政治經濟結構的限制外，也存在著突破的機會，例如：在農業經營面上，過去原住民的民族性、勞力、技術、缺乏市場知識等刻板印象，被解讀為原住民的經濟表現落後的原因。楊蕙禎（2007）就東埔與草坪頭兩個分別為原住民與漢人經營的茶區進行調查。儘管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經濟表現與社會網絡關係上存在著差異，楊強調網絡的連結與突破可以解釋原住民茶農在茶業經營成功的原因（楊蕙禎，2007）。另外，在以部落為單位的農業發展中，劉佩琪（2009）討論原住民的農業土地利用與部落之間的關聯，為了解決國家政策所導致原住民經濟發展邊緣化的問題，劉認為藉由部落內部跨尺度的群體與外界互動，並在以信任為前提的合作關係下，引入外來制度和部落自主性運作，才有機會提升部落農業的發展。

由此看來，為了達到產業發展的目的，原住民在維繫生計的策略上，必須跨出既有的社會範疇尋求新的資源，才有機會在保有原住民的身分下延續產業。不過，在尋求機會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諸如原漢衝突，跨部門溝通不良等阻礙。此外，不同的部落有其獨特的社會脈絡，因此上述對於產業合作與競爭的機制並不能一體適用。

根據上述對於原住民生計變遷的研究中，不論從巨觀或是微觀的角度檢視在變動中的原住民社會，其各自展現了原住民在面臨國家、市場力量下的變動性和地方社會的多元性。部落產業的發展之所以可以延續，部分原因為內部社會與外

部社會調適的結果外，原住民如何突破自身在產業發展的限制與他者周旋，以及外人如何看待原住民在農業生產的觀點，在過去言的研究中較少理解。在此，從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的案例中，原住民和高山茶在社會的脈絡也是值得討論的焦點，例如：消費者或是國家如何看待作為台灣精緻農產品的「高山茶」與代表國家本土意象的「原住民」的觀點。

我認為從高山農業的脈絡中，原住民的生計調適不僅是政治經濟作用的結果，此一調適的過程並非停留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而是要進一步的探究在不同時期和空間中，影響原住民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力，以及其如何回應的動態過程，才能夠更貼近真實。因此，我藉由在地理學和人類學在原住民研究中對原住民性的討論，並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二、原住民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2003 年定義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 指的是住在特定範圍的少數族群，這些人通常是該領域的第一族群，並過著他們原初的生活，其社會、文化和經濟形式有別於國家社會，在殖民時期或是抗爭事件中為弱勢的少數³。對國家而言，這群在生活習慣、傳統習俗、語言和社會制度不同的人群，不論在文化或是生存的空間，有別於主體社會，被視為特殊的存在 (Radcliff, 2015; Yeh and Bryan, 2015)。

正如同 Bryan (2009) 認為以地圖的繪製作為領土的宣稱，是一個將地圖的生產作為空間、知識與權力的過程。在殖民時期，原住民被排除在國家之外，被

3 轉引自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ition 中對 Aboriginality (Indigeneity) 的解釋。在澳洲或是加拿大地區多用 aboriginal people/aboriginality；在其他地區則用 indigenous people/indigeneity。

視為先驗於西方社會或是現代的存在，在地圖上，原住民好比是再現地方與認同的本質化結果。Bryan 認為由地圖再現的原住民性，描述的是一組關係，因此要進一步的檢核原住民性的生產關係，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客觀的事實。



在近幾年的討論中，原住民性 (indigeneity) 逐漸取代了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 作為一個分析的觀點。原住民性指涉的是原住民的集體，對原住民性的理解已經從特殊性到普遍性，族群將不再是作為特定的分析單位，原住民性的意義不只是停留在特定的地方，或指涉特定的人群，而是包容更多爭議所來的影響，例如：殖民時期原住民的邊緣化、或是土地爭議等 (Li, 2010; Merlan, 2009)。

Radcliffe 進一步地提出原住民性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體制和經驗，指的是一個多重尺度、多重行動者，以及在特殊的地方脈絡下，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構築起來的概念 (Radcliffe, 2015)。同時，「原住民性是生活、實踐和關係的，原住民並不是等待被分析的客體。」 (Hunt, 2014)，換句話說，「原住民性可以被定義為原住民和地方的社會-空間的過程和實踐」 (Radcliffe, 2015)。在此，原住民性在關係中為多重的、具有時空動態的性質。

原住民性是來自於受到歐洲高度殖民的國家所衍生的概念，例如：美洲、澳洲、紐西蘭等；然而，同樣的概念在亞洲則不盡相同 (Baird, 2015)。在歐洲的殖民脈絡下，原住民被視為第一族群，是一個先驗的存在；然而在亞洲由於在膚色或是種族上很難直接分辨誰是原住民，因此，原住民在亞洲國家⁴的脈絡具有爭議性 (Baird, 2016)。而在台灣，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理解在 1980 年代之後才有較清晰的圖像。歷經日本殖民以及戰後新政權的政治經濟作用影響，相較於以漢族為主的社會組成，身為少數族群的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持續的受到壓

⁴ 根據 Baird (2016) 的研究，在此指的亞洲國家為柬埔寨、緬甸、尼泊爾、泰國、中國、寮國、越南等國。

迫（謝世忠，1987）。

對原住民而言，這股相對被剝奪、歧視的共同經驗，在往後以「原住民」為統稱的正名運動中，成為對外政治策略的號召，因此，原住民「擺盪在母體部落社會以及『多元一體』的原住民認同之辨證發展間，……，原住民各族群可以因應不同情勢與議題，進行靈活的個別性行動或合縱連橫運作。」（紀駿傑，2005）。此一呼應了上述 Radcliffe 對動態原住民性的見解。

接續上述對原住民性為動態過程的探討，台灣的原住民研究中也類似的觀點與批判。紀駿傑（2005）針對過去社會面和學術界對原住民的理解，他認為「當原住民社會持續被漢人學者以『傳統』的形象與內涵描述、分析時，不但更加深了持續演變、發展的漢人社會與『保持傳統』的原住民社會之鴻溝，更強化了漢人學界與社會相對於原住民社會的知識/權力的對等關係。」。另一方面，在既有的原住民研究中，原住民部落被化約成一個界線分明的區域，不論在生態農作或是社會經濟的變遷中原住民被視為「他者」，等待被「發現」（王俊豪，2013）。然而，原住民並非為靜態的名詞，在真實生活中，原住民所面臨的處境遠比想像中更為複雜。

以地處中央山脈內的梨山地區為例，自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政權洗禮，以及在高山農業的政策下，梨山地區原本為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在與市場經濟接軌的過程中，逐漸轉變為台灣高山農業的基地。當地的族群也隨了政治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原住民、外省人和漢族（包含客家人）混雜的情形，而各族群也因為對於家、資本和環境的意識形態不同，因而衍伸了土地利用的衝突。而在梨山的新佳陽部落在高山農業轉作的過程中，外來的投資客和市場制度雖然使部落的發展呈現衰退的樣態，但也成為了部落青年企圖翻轉部落的契機。假若持續地將原住民視為一個相對固著的群體，將會看不清其在回應主流社會過程中的動態樣貌。

綜上所述，原住民性是多重經驗的結合，在時間上跨越歷史，在空間與身分的認同上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Radcliff, 2015）。原住民性的變動就如同 Shaw 和 Herman 等人（2006）的觀點，「所謂的『傳統』並非一陳不變，而是透過現代性的影響，已經與之妥協、抵抗，以及選擇性的挪用」，也因為如此，原住民性的再現策略也隱含著政治性。

三、原住民性與政治生態學的互補

原住民性是一特殊歷史的不平等和掙扎的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循環的過程，而非固定不變的定義。在 Yeh 和 Bryan（2015）將原住民性的概念帶到政治生態學的討論中，其認為原住民性的循環過程與政治生態學主要的三個理論的面向不謀而合，分別為：1.文化生態論討論自然環境與文化認同的連結 2.生態人類學家專注在文化政治性的適應和回應環境變遷 3.馬克思主義啟發小農經濟的農業研究。然而，這些討論方式存在著將原住民本質化或是浪漫化的風險，最終可能會形成一個認同的分類（Yeh and Bryan, 2015:531）。因此政治生態學在原住民性概念的解讀上，採取一個較為批判式的觀點，挑戰先前將原住民性作為本質性的宣稱，並進一步與原住民在族群認同、土地利用和環境治理上所面臨的困境進行討論。以下為原住民性在政治生態學的解讀與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觀點對話。

1.原住民性作為政治認同

從 Robbins（2012）所歸納出的環境主體和認同論的觀點可以說明原住民和土地所有權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當環境行動或是相關的法規制度改變的同時，牽連到以該環境維生人們的基本生計時，人們會連結不同團體，跨越階級、民族和性別形成一股自我認同（Robbins, 2012）。原住民在環境行動不只反映對資源使用的衝突，也反映了抵抗北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或是對爭取主權的訴求。換句

話說，原住民性的內部張力存在於單一或是全球的情境中，使得其浮現於多變且不確定的場合，相較於其他群體，原住民性是一種集體性的象徵，並藉由宣稱連結到他們的掙扎（Castree, 2004）。然而，這有可能導致對原住民本質化，或是浪漫化對原住民的想像。

2.原住民的再現與論述：將原住民單一化的風險

打破將原住民性做為一個固著的地方認同和本質化的理解，以及了解如何利用這份認同以連結國家治理和政治經濟的策略位置，有助於釐清原住民再現策略背後的衝突、複雜性、變動性和原住民社會的異質性（Li, 2000；Yeh and Bryan, 2015）。相關的討論反映在將原住民性視為自然與社會二元分化的觀點，以及原住民集體的土地議題上。

基於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想像，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不假思索地套用在原住民身上時，將社會與自然的二元劃分的思維，讓原住民族面臨再度邊緣化的風險（官大偉，2014；陳毅鋒 2009）。此外，對原住民的想像也牽涉到認同政治和分配的問題，若將環境從自然中抽離，並將之簡化成「女性」、「土著」、「社區」和「在地」的理解，如此浪漫化的想像會再次形成農業與環境之間的斷裂（Agrawal and Sivaramakrishan, 2000）。

原住民土地權和保護之間的關係，以及財產化和集合的土地所有權（land titling）等共同性的複雜問題，間接地影響原住民對土地利用的想法（Tsing, 1999）。Tania Li（2010）討論原住民性、資本和剝奪之間的關係，她將研究聚焦在亞洲集體的、不可分割的保留地與原住民性問題，尤其是新政權以及不同時期的殖民者在土地、資源的配上，產生不公平的支配性和排除性。Li 批評新政府將集體土地持有機構化，將原住民簡化與自然化，此現象表現在將「部落」和

「原住民」之間當作一個模糊的集體，而忽略了鄉村人們土地被剝奪的過程，其也暗指了此一結果為國家治理不完全下，衍生出違法事件和衝突的印證。當大部分的人將原住民當作是永恆的、一群附屬在特定地區的群體，並將其作為他們的文化象徵的同時，Li 更深入的探討原住民和其在土地上生活實踐更深的意涵，並進一步討論原住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在國家、市場試圖確立並掌控的情況下，忽略了其「自然的」集體的土地所有權（Li, 2010）。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的檢視原住民族在環境資源取得過程中的政治性。

3.原住民性與環境

政治生態學家認為位於資源邊緣的少數民族的掙扎與廣泛的社會和生態變遷相關，例如面臨土地發展的邊緣性、環境資源的減少，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可能威脅其生命，同時也顯示了其在高風險環境中的脆弱性（Coombs et al., 2012；Hunt, 2014；Altamirano-Jiménez, 2013:74）。在資源管理方面，Altamirano-Jiménez（2013）認為原住民在自由主義市場中，被建構在氣候變遷議題下環境保護守護者的角色，並接合（articulate）了原住民性為環境保護的意象，然而，在環境保護、倡導綠色經濟的發展計劃中，實際上，原住民的生活環境持續的受到剝削。

此外，當資源的邊緣被非營利組織納入環境保護的重點，藉以抵抗全球資本的力量時，原住民也會透過全球化的行動，藉由市場的管道喚起消費者的同理心，以增強其在資源邊緣掙扎影響力（Hunt, 2014）。在此，在面臨共同的威脅下，跨尺度的原住民性轉為一種動態的形式。

然而，我們必須再次檢視對原住民存有既定的想像，例如：原住民比較自然，原住民的土地利用方式較落後、較不永續，或是應由國家取代原住民作為資源管

理者的位等意象，並藉由多重尺度的分析，進一步的打破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Coombs et al., 2012；Neumann, 2009）。



將研究經驗轉到台灣，同樣地從原住民的敘事出發，可以發現國家的環境治理計畫和原住民認知存在著落差。官大偉（2006）以河川作為泰雅族的生計出發點，討論國家以一種凝視的角度檢視地景，而隨著時代不同，被建構的地景再度被政府或是原住民拿來挪用，以塑造出一種原初的景觀。官提出另一套泰雅族與河流的故事，有別於過去人們認為原住民與山林比較親近的看法，其將焦點放在各種看似科學、現代化的資源管理的論述中，部落的居民的回應（借用、妥協、抵抗、恢復）反映出現代性和原住民性之間存在著變動妥協的可能，亦即，原住民性和現代性並不完全是兩個極端，原住民性在某方面可以跳脫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限制而延續（官大偉，2006:18）。

從上述關於國家在環境資源治理過程和族群關係的文獻中可以歸納出，欲了解原住民性變動的過程，必須從原住民的文化脈絡出發，以釐清在國家、市場和土地利用形式之間的關係。有別於殖民時期對原住民的僵化的想像，原住民性的概念在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討論下，轉變為關係性的理解，也就是說，原住民性是在相對高層權力的施為下產生的抵抗，或者是在特定時空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所產生的自我連結（Li, 2000；Radcliffe, 2015）。

因此，原住民最初並不會將其歸類成「原住民」，而是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突顯其作為一個「原住民」，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原住民，並對外進行身分與文化上的宣稱時，身分認同的背後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有待解決。

4.再思考政治生態學與原住民性

在農業研究中，政治生態學家，批判文化生態學者將農人與原住民的論述混淆，甚至將原住民排除在現代之外的分析，將讓原住民再度陷入文化差異、身分認同的不公平待遇（Yeh and Bryan, 2015）。這也挑戰了過去對於原住民性是一個固著、先驗存在的概念，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原住民性是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而變動的。

有趣的是，原住民地理學和政治生態學也有相同的關懷，特別是在自然環境的管理、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以及政治上的身分認同（Yeh and Bryan, 2015）。其中，在後殖民的脈絡下，原住民性概念的開展，提供了原住民地理學不一樣的視野。在我的研究中，日治時期對於台灣山林和原住民的治理，一直到戰後經濟轉型、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原住民意識的抬頭，背後隱藏了不同時期原住民性的觀點是值得分析的面向。

然而在分析時，需留意動態原住民性浮現背後的權力運作。早期的政治生態學過於重視外部性的結構力量，而忽略了對地方社會生態與生活的解釋；另一方面，政治生態學則認為地理學和人類學的對原住民性的探討，較少注意到高壓的資本力量、結構性力量，以及主體性力量的形塑（Neumann, 2009；Yeh and Bryan, 2015）。而為了同時兼顧地方生活的面貌，以及詮釋結構性因子和主體性力量形塑的動態過程，在下個段落，我將會討論原住民性如何做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進行上述的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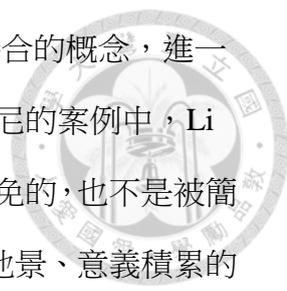


四、原住民性作為分析的概念

Radcliffe 認為原住民性可作為解讀關係的方式，以分析嵌合在不同層次的權力差異，如何產生差異性和主觀的身體政治。在此，「原住民性可作為分析後殖民和殖民研究的切入點，藉由關係性的解讀原住民性，了解其不斷生產、變動（always-in-production-and-spacing dynamic of power and difference），以及在權力差異中的過度性」，為主流敘述提供不一樣的觀點（Radcliffe, 2015）。在既有的研究中，大抵以接合（articulation）和裝配（assemblage）等概念來理解動態的原住民性，以分析其運作的背後所反映的意涵（Baird, 2015；Li, 2000；Radcliffe, 2015）。

在文化研究的領域中，Stuart Hall 延伸了 Althusser 提出社會形構有其主體性，反對經濟化約論的觀點，為接合理論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視野（Hall, 1996）。接合有表達（expression）和連結（connection）的雙重意義，藉由表達、口述、再現的方式將其想法清楚地傳遞；連結指的是在特定的狀態下，將兩種不同的元素偶然地結合在一起，但是連結的本質不會一直存在，可能會有新的事件發生，而產生再結合（rearticulation）的情況（Barker, 2003:59）。

在西方的脈絡中，接合是能夠清楚表達，再現其想法，相反地，與文明相悖的原住民在過去被排除在外（Li, 2000）。然而，從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發，物質的生產方式，組成特定的社會關係及文化面向，在生產模式間產生的接合效果可做為分析的線索（Barker, 2003）。其中，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與資本主義產生對話時，討論接合的情境，在原住民的生產經濟模式、土地和環境面，有著特殊的意涵。



著名的人類學家 Li (2000) 以 Stuart Hall (1996) 提出接合的概念，進一步的說明印尼原住民性在環境事件中如何被提起和重視。從印尼的案例中，Li 認為部落或是原住民群體自我認同並不是自然的或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被簡單發明、調整、壓迫的。相反的，其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實踐、地景、意義積累的動態位置 (positioning)，其為一個牽動外部與內部的動態過程，當原住民被捲入爭議性的事件與掙扎過程中，原住民性將會以特定的形式浮現。

Li 進一步地提出了 tribal slot 的概念，說明在特定情境下，社會情境會製造出某種有利於原住民的空缺，為了得到益處原住民會自動地填補空缺，以達成目的。因此，在動態的情境中，Li 主張接合是變動的，不是固著的，也不是預先給定的。換句話說，原住民性並不是預先存在的實體，原住民的政治認同需要連接到特定的時空脈絡進行討論，將國家治理政策放回原住民的歷史脈絡再檢視，才有機會了解原住民在土地和資源的使用和認同背後的複雜性 (Li, 2000)。

Li 所提出的 tribal slot 的概念提供原住民一個彈性回應市場、國家的方式，帶來一個更為開放、動態的觀點，在某整程度上，呼應了原住民嘗試挪用自身的文化符碼和自然、生態、本土的農業的接合。接合雖然可以解釋異質元素在不同情境中產生的關聯，以打破結構化的限制，然而，在文化研究中，不同要素間的接合層次經常是複雜糾結的，無法明確分析 (陳光興，1992)。

而在梨山茶產業的發展歷程中，並非所有的原住民皆依循「傳統」過生活，反而是根據原有生活經驗不斷的嘗試，打破既有的生產方式，與外界連結。其扮演的角色在地方、市場和國家不同的情境中，原住民性不斷處於變動之中。以茶產業為例，當市場經濟轉向對自然、無毒、生態茶飲的需求時，某種程度上也提供了原住民茶農依循的方向，然而原住民實際上如何與市場接合的過程卻難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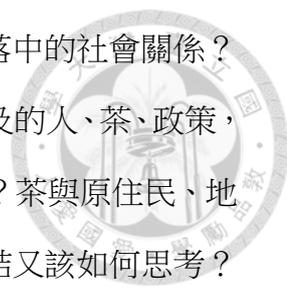
楚的解釋。接著我輔以 McFarlane (2009) 的跨地方裝配概念 (translocal assemblage)，說明接合理論的侷限性。



組配的概念是由 Deleuze 和 Guattari 提出，指的是異質元素的組裝，裝配的過程並非是先驗的，而是強調在不斷變動的關係中的連結性 (Wise, 2005)。Featherstone 以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奴隸反殖民事件為例，從關係性的角度，提供了裝配理論與接合所形構空間的見解。當裝配被視為一組關係時，深入探究特殊的連結，以及政治性的活動，對接合和裝配帶來更多的啟發 (Featherstone, 2011)。在另一方面，Moore (2005) 在分析辛巴威的殖民地景時，進一步延伸了 Stuart Hall 接合的概念。Moore 認為裝配雜揉了人與非人的元素，但是缺乏對權力和結構的解釋，在此，Moore 提出了接合的裝配 (articulated assemblage) 作為接合和裝配的互補概念，強調人和非人之間的關係接合的複雜過程。

此外，Hung (2014) 延續 Moore 對裝配的觀點，強調裝配的權力過程。Hung 提出「邊疆 (frontier) 作為兩難」的機制裝配了多重的二元性概念，也就是說，多重的二元性同時並存所產生的矛盾，為國家在回應市場時推動邊疆改變的動力，並持續地進行與再定義。同時，裝配的動態過程反映在地景的變遷，其同時也體現了少數民族如何重新定義市場的過程 (Hung, 2013)。從上述對於接合和裝配概念採互補的方式理解原住民性的動態過程，可以更清楚地解釋原住民在不同社會情境所面臨的掙扎。

Moore 和 Hung 所論及的裝配的權力過程，提供我對於原住民性在梨山茶產業的思考。其一，茶原本不屬於原住民傳統作物，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轉化為部落主要經濟作物？其二，茶產業政策從過去大工廠集體生產，轉向精耕細作，直到近年推動茶葉食安認證等措施，又如何影響原住民茶葉產銷的論述？其三，高山



茶的產銷，又如何牽動梨山地區原漢居民互動的日常，以及部落中的社會關係？媒體報導中所見的原鄉茶葉並非只有浪漫的懷想，而上述所提及的人、茶、政策，以及和茶有關的生產環節，又如何形構出所謂的「原鄉茶葉」？茶與原住民、地方與國家、自然與文化、固著與變動的原住民性之間的異質連結又該如何思考？因此，我嘗試以裝配理論從更廣的面向，討論原住民性的變動。

McFarlane (2009) 以 Deleuze 和 Guattari 的裝配理論，說明社會事件中異質群體的匯聚與連結的流動性，以及其與社會行動偶發的關聯。McFarlane (2009) 在社會行動的研究中，他認為跨地方裝配的社會行動跨越了特定的地點，並交換了想法、知識、實踐和物質。此外，跨地方裝配的討論跳脫以空間為單位的分類與結果，反而呈現了符號化的事件與展演。

在近期的原住民地理學研究中，Baird (2015) 借用 McFarlane 的跨地方裝配 (translocal assemblage) 的概念，以說明寮國的原住民性如何連結在複雜的跨國、區域、國家與在結構的過程中浮現。另外，跨地方的概念除了強調全球與地方的關聯性之外，也關注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Baird (2015) 在跨地方裝配理論的操作上，藉由分析國家、區域與地方尺度對原住民性的作用，能更有彈性地解釋動態的原住民性。

回到梨山的案例，原住民性的實踐與再現是源於地方發展的跨界行動，並非只有發生在部落，其同時也反映在茶葉的生產環節、由茶葉產銷所形成的社會網絡，以及從國家如何看待原住民的觀點。換句話說，原住民性的浮現在不同時空中的尺度和權力運作的模糊地帶，在台灣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中，原住民轉作茶樹，以回應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土地利用、人力配置、身分認同，以及個人在部

落的位置，穿梭在個人與群體，地方與地方，以及地方與國家之間，各自存在著偶發的變動與矛盾。在此我認為接合與跨地方裝配概念的互補，相較於 Moore 提出的接合的裝配，在尺度的討論上可以進一步地捕捉原住民性的動態過程。



與 Baird (2015) 不同的是，高山茶作為原住民新型的經濟作物，其代表了外界的資本力量、消費者如何想像自然，以及原住民在產茶、製茶、賣茶的日常生活實踐過程，這些複雜且相異的因子，如何藉由偶然地市場機制再度的接合台灣提倡本土農業論述的想像。以接合與跨地方裝配的互補回應原住民性的討論，為所謂的「在地」、「本土」的論述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

因此，為了進一步的了解原住民如何藉由產茶、賣茶的過程，以及其如何開始重新理解自身作為原住民的位置，並挪用不同與原住民相關的元素與他人做出區隔，進一步的打破對原住民既有的刻板印象，我嘗試以接合和跨地方裝配的概念說明動態的原住民性如何再現與實踐於原住民產茶的日常生活中。

第二章 研究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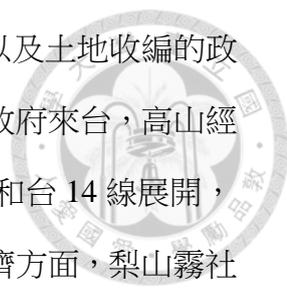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區選定



一、田野點的選擇與經營



圖 1 梨山、新佳陽、霧社、廬山位置圖(作者自繪)



梨山霧社地區的高山農業從日治時期對山地資源的控管，以及土地收編的政策開始，國家力量進入到高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隨後，國民政府來台，高山經濟納入了台灣經濟體系。高山農業發展沿著台 7 甲線、台 8 線和台 14 線展開，高山地景與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隨之轉變。其中，在經濟方面，梨山霧社地區的原住民生計以高冷蔬菜、溫帶果樹和高山茶產業為主。其他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榮民，以及自中橫開通之後上山耕耘的平地農民的生計方式除了與大多數的原住民相同之外，也有人從事旅館業或是餐飲業。也就是說，梨山霧社地區的在人口組成和土地利用的複雜度甚高，此外，不同族群面對產業變遷和土地利用態度也有所差異。

本研究為了要進一步了解高山農業轉作之後，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因此分別選取了由平地資本家帶動茶產業，而現在相對沒落的仁愛茶區的霧社部落和廬山部落；另一個是位於梨山茶區的新佳陽部落，其為台灣目前海拔最高的茶區（如圖 1）。本研究以新佳陽部落為主要的田野點，探究外來資本不斷挹注的原鄉部落，如何與外界進行調適的過程，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接合了原住民性。由於原住民種茶的案例為台灣高山地區普遍性的趨勢，因此，我也同時捕捉仁愛茶區的產茶狀況，作為輔助說明。以下為兩個田野點的簡介。

1.仁愛霧社、廬山茶區（霧社部落、廬山部落）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霧社部落與廬山部落的賽德族屬賽德克系統，其以中央山脈白石山的北側，知亞干山東陵上巨大的白色石柱（白石 Bunohon）為祖先發祥地。賽德克人分布於南投縣濁水溪上游，分成霧社群（Tgdaya）、拖落閣群（Truku）、道澤群（Toda）（廖守臣，1984）。霧社部落的賽德克族屬霧社群，舊名為巴蘭社，其位於現今霧社的高鋒巷內，目前該地的住戶約九戶。而廬山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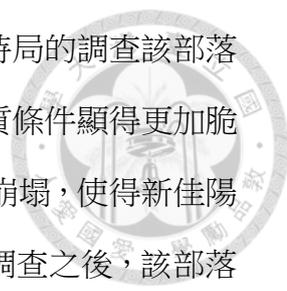
落 (Alang bwarung) 屬拖落閣群，目前人口約 800 人。土地利用的情況約有一半租給平地人，剩下一半的土地由自己耕耘 (田野筆記，2016)。

霧社地區的產業歷經多次變動，曾陸續種植過香菇、紅肉李、金針、梅子，以及高麗菜等。在民國 68 年時，天仁茗茶率先在霧社地區種茶打響了「天霧茶」的高山茶品之後，接著在廬山地區推出「天廬茶」，自此霧社和廬山一帶的產業轉變成高山茶。時至今日，兩個茶區以產茶為主要生計，不過受到高山茶風氣的影響以及混茶的風波，茶葉銷量不如以往，有部分的居民轉高麗菜，近年則有青年返鄉種茶趨勢。

2. 梨山新佳陽茶區 (新佳陽部落)

新佳陽泰雅人的祖先為薩拉茂群 (Mesuramao)，三百多年前從 南投仁愛鄉發祥村遷入，群居在雪山南方大甲溪上游兩岸的平台上薩拉茂 (Salamao)，也就是現今的佳陽沖積扇。在清代時有四社-卡瑤 (Kayo)、坡里莫灣 (Polimoan)、奇雅伊 (Kiyae)、波諾亞干 (Panayangan)，其中有一部分奇雅伊社人遷至卡瑤又稱坡里莫灣，兩社並稱為薩拉茂群，屬賽考列克群，係白狗群之支派 (瓦歷斯·諾幹，余光弘 2002)。

日治時期的舊佳陽原本是位於大甲溪旁的泰雅部落，在民國 49 年中部橫貫公路通車之後由於公路建在部落上方，公路沿線發生了土石流，在部落內有崩塌的情形，再加上民國 57 年為了要興建德基水庫，省政府考慮到族人的安危，將族人遷居至海拔較高的佳陽新村，也就是今日位於台八線上的新佳陽部落，其海拔略低於福壽山農場，大致在 1500 公尺到 2100 公尺之間，與福壽山相對 (田野筆記，2014)。部落的土地劃分為原住民保留地，同時也是在梨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輔導的其中的駐點，未來將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為觀光熱點之一。



在環境方面，新佳陽部落位於德基水庫上方，根據水土保持局的調查該部落有地滑的情況發生。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對外交通不便，其地質條件顯得更加脆弱，尤其是在七二水災過後部落兩側的山溝和中橫公路下方的崩塌，使得新佳陽成為封閉的孤島，在近年來出現了部落遷村的討論，但在經過調查之後，該部落已經打消遷村的想法。

在產業方面，在溫帶果樹盛產的時期新佳陽為溫帶水果的產地之一。然而，隨著市場競爭激烈，以及其海拔高度高於梨山其他部落，果樹上市時間比其他三個部落晚，不能與之競爭（田野筆記，2015）。部落內僅有少數的泰雅人和平地果農種植果樹與高冷蔬菜，絕大部分都以轉作茶為主，從最初的 3 甲地到目前的 17 甲地，目前還在擴張中，其中在部落裡種茶的大多是從鹿谷、竹山、阿里山等外來茶區的茶農。除了新佳陽之外，其他如環山、松茂、梨山部落也有少數人在種茶，而新佳陽茶園的生產面積最大且最完整，本研究將以此部落作為高山農業的縮影，並勾勒出動態地景的掙扎過程。

部落人口組成大致上可以分成泰雅人與自中橫開通時就上山務農的平地人，而工人和外來茶區的茶農則是在農忙時期才會上山暫居在部落中。根據統計部落內大約有 60 戶，但實際上鮮少有人居住，除了夏天有老一輩的泰雅人與小孩上山避暑之外，少有機會見到青壯年的泰雅人。部落面臨口嚴重外流的問題，令人感到弔詭的是平日杳無人煙的部落，在採製茶時期會有許多的茶商與愛茗人士聞香而來，使得新佳陽頓時變成熱鬧的山城。

從台灣茶由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歷史脈絡中，以理解茶葉在高山農業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聯，以回答原住民性如何從原住民族的茶產業的實踐的過程彰顯，並在生產背後原住民族在土地資源使用的掙扎，並複雜化原住民族與自然之間的關

係。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高海拔茶新興茶區的代表－梨山茶區（新佳陽部落）作為探討原鄉部落茶業如何與外界互動的過程，另外，我也以霧社茶區（霧社和廬山部落）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實踐的觀察作為輔助說明。



二、初入田野

2014 的冬天，我加入了伯邑老師的高山農業研究計畫，開啟了我的研究之旅。由於初到梨山並沒有熟識的人，對茶葉研究一知半解的狀態下，為了能夠在短時間理解梨山茶在高山農業的動態，在第一次的田野，我透過和平區農會的管道聯絡到梨山茶業產銷班班長，在班長的引領參加了梨山地區的茶道推廣協會的聚會，接觸到本研究主要報導人－喬伊姊，而我也被順勢地帶到本研究主要的田野點－新佳陽部落。

喬伊姊為泰雅族第二代，其父親在梨山大街和新佳陽地區頗有聲望，在喬伊姊接手家業轉型之後，也逐漸成為部落裡數一數二的茶家，在梨山地區小有名氣。「看不出來我是原住民吧！」第一次和喬伊姊見面時她邊開車邊說著。由於搭公車到梨山大街之後，就沒有大眾交通工具足以讓我在山間自由移動，因此，在交通方面，大多都是喬伊姊開車帶我往返梨山大街和新佳陽部落，而這也成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此外，有關高山茶葉的知識，以及對新佳陽部落的文化歷史和對部落日常生活的了解，絕大多數的資料來源從喬伊姊在梨山地區人際網絡出發，其中包含了梨山、新佳陽和環山部落的親友，以及在茶道協會的原漢茶農等，這些都構築了身為非原住民的我在梨山新佳陽部落的故事片段。

另一個在仁愛田野點籌備的契機，起因於在 2015 年的南投茶業博覽會上，結識原住民茶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員，因此，後續的約訪對象多為合作社的成員，而在研究中我取幾位在仁愛、霧社地區較具有代表性的男性賽德克茶農（茶師）的故事進行說明。

在研究素材的取得上，研究者的性別也影響著田野的進行。身為女性研究者，在山上做田野時不免會引起居民的好奇與關切，「你一個女生漢人，怎麼敢一個人來我們部落？」是我在山上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再加上本研究的主要報導人為女性，因此，身為女性研究者，在部落裡我時常受到居民的照顧。此外，女性的角色也影響我在不同的訪談、共食場合和在不同居民家的居住經驗。

三、訪談對象

本研究自 2014 年 11 月到 2016 年 7 月分別到梨山進行 7 次訪談，仁愛 3 次，到田野的時間為三到十天不等。另外，我也追隨主要受訪者參與的大型茶展 6 次，在這段期間我拜訪了原漢茶農、果農、平地茶商、製茶師，共 21 位。

表 1 受訪者列表

訪談者代稱	受訪者身分	受訪次數
喬伊姐	泰雅二代茶農	9
陳媽	泰雅果農	2
洪阿郎	平地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2
磊哥	平地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3
安哥	平地茶農（外地移入）	1
劉大哥	平地茶農（外地移入）	1
龍哥	阿美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2
阿金	泰雅居民	2
阿奇	泰雅/平地茶農	1
劉爺爺	泰雅居民	1
明正	泰雅居民（社區發展協會會長）	1
周仁	泰雅二代果農	1
周達	泰雅居民/過去為縣議員	2
黃老闆	平地茶農兼製茶師（外地移入）	1
虎哥	賽德克茶農/茶葉生產合作社理事	2
文德	賽德克二代青年	2
孔哥	賽德克茶農兼製茶師/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
孝全	平地茶葉經銷者	2
智明	賽德克茶農兼製茶師	1
老唐	平地茶師	1
茶葉專家	茶改場茶葉專家	1



四、研究限制

1.研究時程的限制：本研究以最初的田野點—梨山新佳陽部落為主，為了要更廣泛的理解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的現象，於是在梨山茶區附近仁愛、霧社茶區進行調查。霧社的田野是在 2016 年 2 月之後才開始涉入，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蒐集到的資料相對少，不過霧社茶區在原住民的茶產業發展主軸中具有代表性。另外，在台灣的高山地區（例如：仁愛的紅香部落、阿里山的達邦部落）有許多的原住民從事茶產業，其經營型態有別於梨山或是霧社地區的形式，但因為交通易達性，以及時間安排等原因，沒有辦法一一到訪。

2.語言：由於田野報導人和老一輩的族人在訪談時或是在生活上會用族語溝通，有時候他們會用族語討論一些部落內較嚴肅的事情或是私人性的事情，此部分研究者較沒有辦法捕捉到所有的對話，不過，必要時，族人也會熱心地用中文和研究者溝通。

3.敏感性議題：研究過程中，大多數的訪談場合都有原漢居民在場，因此有些較敏感的土地議題較難蒐集到資料。假若是原住民的場合，族人多以族語提及，或是語帶保留。因此，這部分的資料，我多從主要報導人的陳述，以及諸多受訪者的隻字片語中得知，另外，我也透過另一位長期出入新佳陽茶區的茶商對新佳陽原漢土地利用的觀點進行分析。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了能夠理解新佳陽種植茶葉的歷史脈絡以及茶園地景的變遷與部落發展的關係，以下將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發問分述。

一、 理解台灣茶由低海拔往高海拔擴張如何嵌入高山農業：文獻分析與訪談

為了對台灣茶發展的脈絡有初步的理解，我整理與分析高山茶相關歷史報導、茶改場關於茶業政策和茶葉產銷的文獻資料、相關推廣新興茶區的文獻，主要分析台灣茶業由外銷至轉向內銷之後的發展，與當時國家社會經濟、國際貿易的情勢，並釐清茶產業的空間變遷與台灣社會經濟的連結關係。

在茶葉產製層面，為了解構「高山茶海拔愈高茶葉品質愈好」說法，國內外茶書對於高山茶較好的說法、茶葉產製、海拔與茶湯澀度、特殊地方味的論述資料蒐集與比對。雖然從文獻中可以了解台灣茶由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歷史發展，以及文本中所呈現的高海拔論述。

自 2014 年到 2016 年間我拜訪了茶葉相關的專家、平地 and 自產自銷的泰雅茶農、茶商、製茶師傅以及採茶工，以及透過茶展觀察消費者與茶商之間的對話，以理解消費者對於高山茶的想像。從這些訪談中，我記錄了不同的階級與族群的人對高海拔的梨山茶的陳述和看法。

二、 茶產業與原住民的關係：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觀察法

當茶產業在新佳陽發展的過程中，為了瞭解當地的梨山霧社的原住民是如何看待的轉變以及被邊緣化的泰雅人和平地人如何藉由茶葉的生產和銷售維持現今的茶園地景，並進一步探討在中橫封路過後，新佳陽部落如何藉由茶葉的生產和銷售翻轉以往對於梨山原住民部落的意象。



我將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取得相關資料。藉由古邁茶園的主要報導人滾雪球式的介紹部落內的成員並進行拜訪，其中，我的訪談對象有部落的頭目、耆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泰雅茶農和在新佳陽的平地茶農，而除了部落內的成員外，我也從梨山的茶業產銷班和當地的茶藝推廣協會的角度理解當地茶農如何理解梨山茶。在霧社茶區則是從原住民茶葉生產合作社的相關社員進行訪談。此外我也從不同的訪談中得知不同世代和不同族群對於發展茶葉的看法。

另外，為了要更進一步的理解原住民如何種茶、製茶和賣茶的過程，必須要在親臨現場觀察或是參與實際採茶、賣茶。梨山茶一年只採 2 到 3 季茶，因此每年的 5 月、8 月與 10 月為必須拜訪的時間，一方面是可以深入的觀察泰雅人對於茶葉產製的實踐，另一方面有機會遇到從外地遠道而來的茶師傅、茶農、採茶工、茶商，以及少數回部落幫忙的族人。而霧社茶區一年採 3 到 4 季茶，產期為每年的 4 月、6 月、8 月以及 11 月，採茶和製茶大多由部落間的勞動力提供，假若遇到缺工的情況才會從外地請工。因此，從勞動力、製茶師和盤商的流動，我可以更進一步的理解茶區的動態樣貌。

三、原住民性的展演與浮現：半結構性訪談與參與觀察

為了可以更加瞭解部落內的不同族人與自中橫開通以來進到該的拓墾的果農，和外來茶區的茶農之間的互動、產茶的過程，和其對外的市場關係，我採取參與觀察法的方式到主要報導人參展的攤位幫忙賣茶，並觀察消費者和主要報導人的互動，從中得知消費者對高山茶的想法。從而解讀位在中央山脈的新佳陽、霧社和廬山部落的景變遷如何與外界互動，彼此之間的論述力量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的實踐體現原住民對於土地的關懷，並從原住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尤其

是在茶展、觀光展或是政府官員的視察等特殊的場合，原住民族常會展現有別於一般生活的樣貌。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以台灣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為例，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環境保護的議題開始被強調，同時在食物生產方面也開始強調食物生產與環境之間的關聯，也就是說，與環境相關的農食生產，必須要顧慮到環境永續的價值觀，而這樣的價值觀很容易和原住民的作為環境的守護者，和生態知識的擁有者連結起來。

茶並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在台灣有不少跨部落的原住民轉型以產高山茶為生，當原住民以其文化包裝著自然生產的茶的同時，再現外界對於他們想像。然而，此一浪漫化原住民的想法，可能讓其在高山農業的發展歷程中，逐漸的被排擠到邊緣。因此，我將以高山茶產為例，進一步的探究在茶業生產的過程中，不同族群在茶產業的實踐，其中涉及到環境資源的取用、土地使用的政治性，以及討論原住民如何藉由產茶、賣茶以建構其主體性。

本研究章節安排從梨山茶葉發展的背景開始，分別就茶葉的生產、製造與銷售進行故事的鋪陳，並從不同的生產階段中，捕捉動態的原住民性：

第一章：說明原住民與高山茶業發展的現況，有別於過去我們對於原住民的想像，並分別就前人對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的研究和原住民性的概念進行文獻評述。本研究以原住民性的概念，藉由對原住民與茶產業的關係的解構，結合政治生態學和當今對原住民性的討論，嘗試補充過去地理學和人類學對原住民過於結構性的解釋，以及對原住民過於本質化的批判。

第二章：說明選擇田野點的理由、研究對象與研究限制，以及運用訪談與參與觀

察方法蒐集梨山地區高山農業的相關資料、與高山茶產業相關的生產環節，包含人、土地、資金、環境等等。

第三章：主要分析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台灣茶如何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原鄉部落的政治經濟歷程，並透過茶產業在新佳部落的發展，說明山地與平地的互動關係。透過分析歷史和部分的田野資料素材，分別拉出不同時期的政權下，國家看待高山地區原住民的觀點，以及高山茶如何在回應國內外市場的市場中，建立起在地性的論述。最後，分析市場機制的運作如何連結茶與原住民這兩項不同的要素，進而開啟梨山的高山茶產業。

第四章：接續第三章提到原鄉部落茶產業的背景，本章討論原住民如何藉由茶園管理的日常生活的實踐並嘗試與非原住民做區隔的過程。分別從原住民投入茶產業的轉折和適應的過程，以及討論茶葉市場的運作如何接合外來的科學技術和傳統農業知識，實踐出原住民茶農對茶葉「自然」、「原味」、「生態」的宣稱，並討論在跨尺度的作用下，原住民性論述生產的政治性。

第五章：回應前兩章的討論，本章以台灣茶葉市場對於本土茶葉需求的焦慮感為背景，分別以梨山茶產地認證事件和原住民在不同的茶葉展售場合的再現與展演，分析原住民在不同的位置和特定的場合中，再現的原住民性如何接合了國家和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較為本土、自然的想像，以及討論原住民性浮現過程中曖昧、模糊的矛盾。

第六章：誠如題目：「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本文從梨山高山農業的脈絡出發，重新思考原住民和高山茶產業所面臨的困境，並試著打破對於原鄉浪漫化的想像。我以 Radcliffe (2015) 將原住民性視為關係的概念作為分析視角，以理解原住民的茶產業接合在不同尺度下，原住民性浮現的意涵和原鄉茶產業實踐的複雜性。

第三章 茶葉到原鄉



茶原本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為何現今在高山地區有愈來愈多的原住民開始以茶產業為主要的生計來源？高山茶和原住民這兩者相異的要素如何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下偶然地被接合，並發展成現今的規模？為了解高山茶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本章將探討台灣茶如何上高山，高山茶又如何逐漸成為原鄉重要的經濟來源？原住民又如何在此政治經濟過程的影響下，維繫部落的產業，並尋找其自處的位置？

本章的第一節討論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時間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中橫公路的通車和其他山地道路的修築，山地社會、經濟文化和地景的變遷，並深究台灣高山農業變遷的作用力為何。在第二節，我將解構高山茶在高山地區出現的歷程，並進一步了解茶在原鄉地區作為新的高山經濟作物來源的意涵。最後的第三節，從梨山和霧社等沿中橫公路發展的部落開展出的高山農業型態，我將從國家對原住民的觀點進行分析，揭露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發展的困境，並以轉作茶葉為例說明其在市場中的掙扎，以說明在不同時間、空間中原住民性的動態樣貌。

第一節 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

一、日治時期國家高山地區的治理

1905年，台灣堡圖完成測繪之後，日人得以清楚明確將人與土地掌握在一起。因此，當平地的土地被丈量完成之後，中央山地相對地成為閉鎖空間，傳統空間的蕃地也被確立。大正二年（1913）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督這段期間，總督府的勢力進入梨山。當時，日本人為了探查山林資源分別開闢了東勢郡線和能高

線兩條理蕃道路⁵，並在道路沿線設置警察駐在所（林育德等，2006）。約在 1909 年日人開始興建理蕃道路時，屢遭薩拉茅和斯卡瑤社攻擊而被迫停工；隔年台灣總督兼台灣守備隊司令官佐久間左馬太提出「五年理蕃計畫」企圖收復山地。

在將山地資源收編於國家掌控的過程中，部落和國家之間曾發生不少衝突，當時的原住民族共同攻打的目標是日警的駐在所（陳憲明，1984），或者是向其他部落發動攻擊。其中 1920 年的薩拉茂事件⁶對梨山原住民部族間的影響深遠。總督府採以蕃制蕃的方式鎮壓薩拉茅社，削弱了梨山各社的勢力，並將族人遷移至卡瑤，於是，薩拉茅社在 1927 年成為最後一個歸順於總督府的族群（廖守臣，1984）。部落的族人歷經多次戰亂和遷村的經驗，最後被日人集體遷到德基水庫對岸的坡地。

在日人以武力征服山地之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針對台灣的山林治理推行一套新的空間秩序。以 1928 年的「森林事業計畫規程」為例，日人將台灣的山林分成要存置林野、不要存置林野，以及准要存置林野，其中，准要存置林野可以為原住民所用，其餘的接納入國家的科學林業的管理系統（官大偉，2014）。透

5東勢郡線從東勢出發，一路經谷關、青山、佳陽、梨山到清泉橋，為中橫公路的主線，為台 8 線。能高線從埔里開始，往霧社、瑞岩、力行、翠巒、福壽山、松茂、環山到宜蘭，為中橫公路的供應線，為台 14 甲。兩條公路在梨山到武陵農場的重疊處為中橫公路的支線，為台 7 甲。理蕃道路的路線規劃也為了國民政府時期興建東西橫貫公路提供了基礎（林育德等，2006）。

⁶ 1920 年發生了薩拉茂事件。當年在霧社地區的部落蔓延發生了流感疫情，許多族人因此而死亡，在過去的觀念會認為流感是日人所引起的，所以有必要祈求祖靈驅逐惡靈以除害，並以出草方式獻祭，因此有數名日人和隘勇遭殺害。而流感的消息也傳至薩拉茅社與斯卡瑤社，當時的駐在所 有也遭到社人的攻擊，而日人也出兵討伐並採取以蕃治蕃的方式鎮壓，其中最讓族人憤慨的是當年莫那魯道率領德克雅群、道澤群、太魯閣群、白狗群、馬力巴群和萬大群攻打薩拉茂，此次的事件削弱了梨山各社的勢力。為了可以進一步的管控山地秩序，日人在薩拉茂設置了二駐在所，並將各番社集體遷居至對岸的卡瑤（舊佳陽）和奇雅伊集中管理，最後為了部落全體的安全在 1927 年歸順（廖守臣，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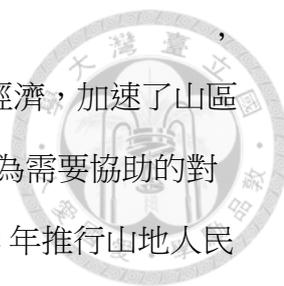
過收編的過程，日本總督府基於對自然資源的取用，將模糊的自然空間領域化，部落與族群也因此被確立下來，藉此排除了原住民對自然資源的取用（洪廣冀，2003）。因此，日治時期的山林治理政策對原住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尤其是生活空間的零碎化。

在農業方面，日治時期以前，高山地區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以火耕、採集和打獵為主，然而日治時期之後，高山地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型態有了前所未有的轉變。以往原住民採火耕的生活，常散居於不同的山區，日本政府為了集中管理，限制原住民的行動範圍。此外，為了便於對原住民進行控管與教化，日本政府除了收繳原住民族的武器槍械之外，在文化和祭祀方面有所限制（黃柏松，2007）。在生產方面，日本總督以農業政策作為手段，將原本採游耕、打獵生活的原住民族，轉化為歸順的農民，以減少對山林水土的破壞。例如：禁止原住民族從事火耕生產，並推廣定耕定農的生活方式⁷，將日人視為傳統落伍的、有破壞水土之嫌的火耕，轉變為定耕稻作或是進行造林（黃柏松，2007）。上述相關的治理政策和作為為國家力量的展現，藉由空間和資源的政治分配，將原住民視為固著（fix）在特定區域的他者。

二、國民政府時期高山農業政策的推動

高山農業政策的推動與戰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政治經濟背景有關。由於當時處於兩岸軍事對峙的時期，國民政府為了國防需要興建橫貫公路，同時為了安置榮民，退輔會成立了福壽山農場以作為高山農業的發展試驗區，開啟了台灣高山農業的歷史（黃柏松，2007）。而高山農業政策的推展對原住民的生計帶來重大的轉變。

⁷ 在日治時期，還存在著火耕的農業型態，直到了戰後，國民政府推廣溫帶果樹事業之後，原住民生活型態才完全地從火耕轉變成果樹種植（黃柏松，2007）。



在民國 40 年起，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⁸改善山胞的生活與經濟，加速了山區現代化的發展。在發展高山農業的初期，國民政府將原住民視為需要協助的對象，進行一連串的現代化建設和生活輔導規範。例如，在 1962 年推行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提倡金錢觀；以及在 1961 年後，藉由山地農牧局、農復會和台中農學院的農業技術輔導，舉辦各種講習，進行一系列如：蘋果、桃、梨等高經濟作物的培育，以提供山地居民另類的生計來源（朱長志，1961；陳茂泰，1973；黃柏松，2007）。農業技術團隊除了提供栽培溫帶果樹的知識外，也宣導種植果樹的經濟價值。此外，山地農牧局也曾針對和平鄉和仁愛鄉的山胞進行農業新知的講習與推廣（溫慕蓀、林源欣，1965）。隨著果樹產業和技術的引進逐漸改善原民族的生計。

此外，國家力量對邊緣地區的介入和輔導，位於高山邊陲地區的原住民開始受到政府的關注。在民國 43 年中央日報的報導中，簡要的提到當時的省主席到新佳陽的情況：「黃主席蒞臨視察時，山胞滿心歡喜的樂烈慶祝並向政府獻旗幟慶，並鼓勵山胞積極地利用山胞保留地，並且在兼顧水土保持的前提下種植果樹和樹木，以提高經濟收入⁹。」顯現了中央政府肯定高山農業發展，並藉由農業技術的協助，以收服民心。然而，山區發展的榮景極可能為一種假象，而忽視了國家市場對原住民的生計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

國民政府在高山農業的推廣原本的立意是要在保護水土的前提下，進行溫帶果樹的種植，並逐步的改善原住民族的生計，然而，在原住民藉由果樹經營並開始接觸市場經濟之後，反而缺乏時間照顧小米等非經濟作物，傳統的糧食作物如

⁸ 山地平地化政策包括：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獎勵山地實施定耕定農，以及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等三大方向。

⁹ 1954-09-28/中央日報/第五版/文化工作隊 昨轉赴桃園 另隊返抵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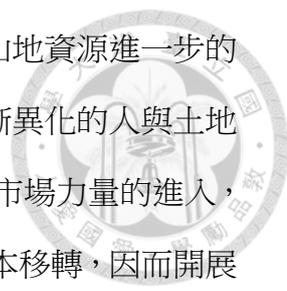
豆類、薯類的生產在此時期大多轉變為高經濟作物。從小生活在梨山，曾經種過小米，之後轉作溫帶果樹的泰雅居民阿金（化名）表示：



以前有種小米、地瓜和玉米，但是後來就沒有再種了……小米很難照顧，在種植的時候不能有雜草，而且還有很多麻雀會去吃小米。小時候我們會用繩子把空罐子串起來，放在小米田裡，如果有麻雀來，我們就拉一下繩子，鐵罐的聲音嘩啞一聲，就把麻雀嚇跑啦！……，後來因為果樹價錢好，就種果樹了。（田野筆記，2015.05.09）

由於溫帶水果的經濟價值高，為了增加果樹的生產面積和產量，泰雅人投注大量的心力在果樹的經營，有些族人精益求精，甚至到日本學習果樹種植的技術（田野筆記，2015.07）。除了有梨山霧社地區的原住民之外，還有退伍軍人和其家眷，以及自中橫公路開通過後，來自各縣市的平地果農上山進行開墾，促進了山地的資本主義化（廖文生，1984）。

然而，在往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原住民在農業生計上的表現，逐漸偏離政府原先的期待，產生適應不良的問題（余光弘，1978）。根據我在田野的訪談經驗，原住民在經營溫帶果樹的過程，並沒有平地人來得順利。有些原住民因為不懂得管理果樹的技巧，為了增加產量，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過多的果樹，但由於考量到就學和就業的問題，梨山新佳陽部落的青年族人大多往都市生活，較少人留在部落裡耕耘果樹，缺乏勞力的結果，使得果樹管理困難，有些原住民果農將果園賤價出租給平地人管理。原住民在果樹經營方面，因面臨資金不足、技術不足的等困境，在民國 70 年代已有一半的原住民將土地出租給平地人投資（陳憲明，1984）。



隨著山區道路的開通，以及高山農業的推廣，國民政府將山地資源進一步的納入平地經濟發展中，而原住民在接受市場的概念之後，也逐漸異化的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對原住民而言，土地是賴以為生的根本，但是隨著市場力量的進入，土地也在背離原住民保留地不得買賣的規定，進行了另類的資本移轉，因而開展了梨山霧社地區遍布溫帶果樹的地景，在創造高山農業經濟效益的背後，交織著複雜的族群與土地利用關係。

三、高山原住民的生計變遷

溫帶果樹的種植曾一度的為高山農民帶來豐厚的收入，對原住民而言，他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富足的生活，但是高度依賴市場的結果，難免面臨市場崩盤的風險。民國 68 年，蘋果開放進口後，由於果價大跌，引發農民大砍蘋果樹的風潮，果農開始轉作梨樹。此外，中橫公路在經歷民國 88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及民國 93 年的敏督利颱風過後暫緩通行，梨山地區的居民只能憑通行證在非管制時間通行，交通不便等因素，使得行口上山收購水果的意願降低，連帶地當地的觀光產業也逐漸沒落，溫帶水果的銷售量也不如以往。隨著山地與平地的市場、技術競爭和天災的影響，果農們陸續轉作水梨、水蜜桃和甜柿等高經濟作物，因此，梨山地區的農業地景呈現了被汰換的果樹或是交錯種植的景觀。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仁愛鄉的霧社地區，因為座落的地點和位置的海拔高度較低，以種植梨和高冷蔬菜為主（陳憲明，1984），在民國 70 年左右才大量轉作茶樹，但是該地的產業在九二一大地震過後也一度沒落（王梅霞，2014）。

從梨山和霧社的生計變遷的現象可以發現到，在中橫公路開過後，所帶入的市場經濟，影響了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經營行為，而過度依賴市場的結果，反而讓農民身受其害。山地和平地的經濟發展，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已逐漸的打破隔離的治理現象。在經濟生活面，原本以山林河流資源維生的原住民，並沒有明顯

的商業行為，但對殖民者而言，山上的農、林、漁、工業資源，可以加以利用，從文化的再現和象徵加以自然化，作為山地經濟資本的累積基礎。日治時期原住民的治理期望可以達到控制的目的，將特定的族群綁定在特定的土地上，進行定耕定農的生活。上述兩個時期在族群和自然資源的使用上進行控制，而到了果樹經濟蓬勃發展時期，已經出現了土地流失或是出現果樹品種轉作的現象。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累積更多的資本，農民必須在果樹管理和品種上創新，暨果樹風潮之後，代之而起的是高山茶。然而，弔詭的是，為了保護山林的水土，台灣政府從來沒有主動地推動高山茶（田野筆記，2015.06.04），那麼，為什麼現今在海拔 2000 多公尺的高山上出現茶園？究竟是什麼機制使得原住民開始投入高山茶產業，將於第二節細究之。

第二節 茶葉上高山

台灣茶由低海拔往高海拔的山區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外在的政治經濟的力量影響台灣茶產業的變遷過程（余寶婷，1997；吳淑娟，2007；陳宇翔，2007）。然而，對於山地內部的社會和經濟的輪廓，以及茶移動到高山地區之後的發展情形，較少研究提及，亦難以解釋現今許多高山原住民以高山茶產業為生計的現象。以下將從台灣茶葉的發展史檢視台灣茶葉市場的變動下，如何逐步確立高山烏龍茶作為台灣本土茶葉的地位，同時也成為高山農業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

一、台灣高山茶的歷史

在 1970 年代，台灣茶受到外銷綠茶市場縮減，以及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台灣外銷市場一度受到打擊。為了解決茶產業外銷量低迷的危機，政府在 1975 年，舉辦一連串的優良茶比賽，以提升茶業內銷茶葉的風氣，到了 1983 年，進一步的廢除「台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自此之後，茶農可以不經申請就可以

自行設立茶廠，並自產自銷。換句話說，台灣茶產業的生產方式從大型茶廠的經營模式，轉變為家庭式的生產，同時也改變了台灣茶產業既有的生產體系。

根據余寶婷（1997）和吳淑娟（2007）對台灣茶產業的研究，以往外銷茶的產地大多分布在北部的淺山丘陵帶，在失去外銷市場後，北部茶區的面積和產量不比從前。若從空間分布的角度分析，台灣茶自 1980 年代由外銷轉自內銷的過程中，台灣茶葉生產水平變遷呈現北消南長，在垂直空間上茶葉的分布為低海拔到高海拔的趨勢，隨著工商業發達，平地的生產成本增加，在外銷受限，同時拓展內銷市場的壓力下，茶產業需要轉型為精緻產業才能維持更高的成本（余寶婷，1997；黃淑鈴，1998）。

十大建設完成後帶動了台灣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提高，帶動了茶葉消費量。各式內銷的活動也如火如荼地推廣中，除了國內的茶藝活動也帶起了飲茶的風氣外，在茶葉改良場和各縣市農會的配合下，舉辦了茶葉比賽，以提高台灣茶內銷的品質（廖慶樑，2010）。其中，1973 年，興建鹿谷「高級茶葉生產專區」，將茶葉生產的等級做區隔，歷經幾年的推廣後，在 1990 年代，鹿谷凍頂烏龍茶逐漸成為台灣好茶的代稱。

隨著愛茗人士在一股追求高海拔茶葉的風潮和中盤商的炒作下，高山茶園一路從鹿谷、阿里山、杉林溪、梨山等高山地區擴張¹⁰，其中梨山茶為台灣海拔最高的茶，若以茶葉的海拔高度計價作為計價的方式，梨山茶的價格不斐。

¹⁰根據茶葉改良場的說明，海拔 1500 公尺以上的茶為高山茶。然而，所謂的高山茶，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說法，不同時代的高山茶，正反映的山地與平地之間的土地開發的壓力，和茶產業市場的轉型。例如：在 1970 年代，高山茶的定義是海拔 700 公尺，到了 1980 年代，鹿谷海拔 750 公尺則是全台灣最高的茶區。隨著茶區往高海拔開發，甚至出現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茶稱做高山茶的定義（田野筆記，2015）。

[民國]80 年之後，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人的消費能力變高，就可以接受這種高價位的茶。（田野筆記，2015.04.10）



茶改場專家則表示：

高山茶的品質好主要是指他的茶湯，也就是說茶湯可以看出整個茶的好壞，海拔 1500 公尺以上的茶葉品質好，但是以前的需求不高……以前的[平地]茶都是同一個味道，比較沒什麼變化，當高海拔的茶葉興起之後，因為高山茶有其價值，所以在買賣間的價格就會比較高；另一方面為它是新的茶，所以就要想辦法創造出新的議題，因此就會有[許多關於]高山茶的報導。（田野筆記，2015.06.04）

高山茶在面臨境外茶的競爭之所以開創新的市場，是藉由壟斷地租的方式，創造新的論述以支持高山茶的獨特性（陳宇翔；2007）。然而，如果沒有實際的討論高山茶的生產過程，說明高海拔山地與茶產業之間的關係，以及討論消費者如何接受新的論述，就無法支持高山茶是如何成為台灣好茶的論述。此部分說明高山茶從何而來，第二部分將提到高山茶如何在部落深耕成為「原鄉茶」？

二、高山茶在台灣高山部落的萌芽

「高山茶」一詞，最早是由梨山陳金地的果農，在 1969 年從鹿谷帶著青心烏龍的茶苗到大禹嶺試種，並率先將其命名為「高山烏龍茶」，但是在當時的內銷市場不受重視（范德光，2004）。

台灣茶葉的發展史中，有規模性的種植和品牌營銷始於天仁茗茶。

剛開始天仁茗茶與仁愛鄉農會合作和霧社地區的原住民打契約，簽訂十年，打十年的契約，陸續推出「天霧茶」和「天廬茶」，據報導人說當時一斤茶葉 3000 元，開啟了高山茶的時代。可惜到了第 4、5 年的時候，天仁公司毀約，轉向更高海拔的信義鄉的草坪頭發展。後來霧社茶區價格就沒有哪麼好了。（訪談資料，2016.05）。

不過還是要感謝天仁阿，沒有天仁我們也不會種茶（訪談資料，2016.02）

儘管兩位年輕時候到天仁公司茶廠作學徒的賽德克茶師傅感嘆地提到，由於霧社茶區發展較久，老茶區的茶葉滋味，不比新茶區的味道好，許多的茶商轉往高海拔地區尋找新的茶菁，使得霧社高山茶的光景大不如前。但他們也認為相對於其他溫帶果樹經濟作物，茶葉的收入還是比較高，不過，其中也有族人將土地出租給平地人，或是轉作高冷蔬菜。

原住民種茶的案例不只發生在南投縣的仁愛鄉，在高山茶區向高海拔擴張的過程中，也依序地在梨山地區的福壽山農場的退輔會用地，以及梨山周圍的原住民保留地和國有林班地帶發展。在 1970 年代末期，因為蘋果進口的影響，使得原本以種植蘋果的福壽山農場，轉變果樹的生產策略，在民國 72 到 73 年間和茶葉改良場合作，開始試種高山茶，並對外販售¹¹。由於福壽山茶的價格不斐，在

¹¹ 研究者曾投書詢問退輔會之所以會種茶的原因和背景，茶改場專員的回覆如下：「（1）民國 68 年起蘋果開放進口，蘋果價格開始明顯下滑，以蘋果為主要產物的退輔會福壽山農場開始試種茶樹，不過面積不大，民國 72 ~ 73 年間開始生產，隨後部份榮民也在大禹嶺種植，隨後在 75 ~ 76 年間，退輔會武陵農場也開始試種，但梨山茶之大量種植是近十餘年的事。（2）省政府時代並不鼓勵高山植茶，因此梨山地區早期植茶是由退輔會推動，本場僅在民國 70 ~ 72 年間受福壽山農場及民國 77 ~ 78 年間應武陵農場邀請，兩度提供產製諮詢。事實上，目前茶改場仍認為極高海拔茶區之開發固然有其價值，但必須審慎評估。」從文中可理解退輔會在經營上採取開放的態度，其也反映了高山茶推廣逐漸受到矚目，然而茶改場對高山茶產業則採取保留的態度。（茶業專訊 105 年 96 期 p1-2）。

當時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購買。20 年前幫忙批售福壽山茶的茶販說著，「以前福壽山茶都是給五院長官喝的」，在退輔會的推廣下，福壽山茶成為福壽山農場的特產，其名氣也傳到鄰近的梨山地區。我以其中的新佳陽茶區作進一步的說明。



位於中橫公路旁的新佳陽部落產業正面臨衰退的情況下，這股高山茶的趨勢也進入到部落內，新佳陽便納入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而茶產業的發展將新佳陽帶入另一個階段。在面臨部落人口流失，果樹產業衰退之際，大多數的泰雅人依舊經營果樹為主或將土地承租給漢人經營，少數泰雅人試圖採取轉作茶葉的策略，以抵抗在大環境下被邊緣化的趨勢，其中最成功的是民國 84 年梨山地區種茶的古邁茶園。

最早種茶的是新佳陽的古邁大哥，民國 84 年，古邁決定要砍果樹種茶的消息震驚了部落裡的所有族人。在 2015 年的二月的冬夜，我和部落的族人談起轉種茶的往事，在場的族人皆表現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喬伊的其中一位親戚表示，當時種植果樹還有利可圖，大家都覺得古邁一定是瘋了才會去改種茶。喬伊也附和著說：「對，那時全村的人都認為我們家瘋了！」。在當時，古邁大哥認為果樹產業未來不能經營長久，總有一天會面臨轉型，不如趁早轉型成茶葉，甚至投資大筆經費建茶廠。因此古邁便成為整個新佳陽茶區的重心。儘管受到族人異樣眼光的看待，古邁轉型的毅力和決心，也影響了往後部落產業的發展。

對原住民而言，種茶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古邁在砍除果樹之後，必須從外地請怪手挖除果樹根系，將坡地整平，同時翻攪底層的石塊排列成階梯狀以護水土，接著到森林裡尋找水源，埋設水路和管線，並種下新一批的茶苗。一般而言，茶苗從種植到採摘需要三年的時間，也就是說，轉作茶葉至少會面臨三年無收入的生活，在轉作的過渡期間，資金籌募便是一大限制。喬伊和陳媽說道還好在轉

作茶樹初期家裡還有另一外在環山的果園撐著，才能養活他們一家人和這片茶園。然而，對其他部落裡的果農而言，果樹還有賺頭，他們對茶產業的發展狀況不甚熟稔，假若沒有足夠的資本，他們是不會輕易嘗試的。



由於轉作初期缺乏完備的生產技術與知識，仰賴各地傳統茶區茶師的流動產茶，製茶師也因新佳陽的海拔高度和茶樹生環境等條件優良，開始向泰雅人租地以既有的技術與知識在新佳陽種茶，而部落內另一群自中部橫貫公路開通以來便在新佳陽務農的平地漢人也試圖轉作高山茶，於是部落中出現了轉作前、轉作中以及轉作後的動態地景，為了滿足市場上對於高山茶的需求，以及部落經濟轉型之下，在民國 90 年左右，逐漸發展出今日茶園的規模¹²。

梨山地區原本是種植溫帶果樹為主，但因為天災和交通不便的問題，果農們主動種轉做高經濟價值的茶樹。在賣茶的部分，霧社茶區和梨山茶區則是仰賴中盤商上山收購茶青，在價格上較無議價的空間。但是隨著競爭者眾，原住民茶農和漢人茶農在社會網絡上存在著差異。在兩個茶區中，很明顯的感受到老一輩的製茶師傅，因其擁有三十多年的製茶經驗，將茶當作是生計，對於茶葉市場的運作瞭若指掌，但是在銷售方面，面對進口茶和其他高山茶區的低價茶無能為力。相對地，年輕一輩的茶農反而將茶當成部落文化特色經營，將自家的茶葉品牌化，茶葉的管理上，也從過去的慣行農業，轉以自然、生態的農法進行栽培，希望能帶起銷售量。

12「梨山地區過去以種植果樹為主，但考慮到果樹的經濟效益佳、種茶需要投入成本技術和三年的經濟空窗期，起初較少農民轉作，僅有福壽山農場進行試驗性的種植。2002 加入 WTO，進口水果的競爭以及每年颱風季影響果樹收成等因素，茶葉變成轉作的選擇。從思源啞口，環山、松茂、梨山、新、舊佳陽，可見愈來愈多的隨著山勢起伏的茶園景觀，尤其是茶樹種植面積最集中的新佳陽部落」參考沈慈雅（2010）對梨山茶專書的介紹的內容，大多與田野報導人所述相似，然而影響產業發展得因此甚多且複雜，本文後續會做進一步的說明。（沈慈雅，2010）。



然而，市場的力量則是後續將這群山區農民導向無可預期的發展。在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產品全球化的結果對山地的農人帶來不小的衝擊，尤其是對順從國家政策發展下離土的原住民。因此，在強調永續農業、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農產品生產端的土地與環境，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關鍵。

第三節 動態混雜：有別於國家理解的高山農業

本章分別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高山農業的發展背景，以及台灣茶產業的轉型過程，討論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發展如何成為可能？高山農業發展的脈絡來看，日治時期總督府將原住民視為較落後的群體，到了戰後初期，高山原住民被視為需要教育、輔助的對象，不同時期的政權對高山地區的治理態度也顯現了國家對中央山地視為相對邊陲的地帶，並將原住民視為特定空間上的群體進行治理。因此，過去在高壓的政權下，原住民的主體性被排除忽視，產生了自然/文化，山地/平地之間關係的切割。

此外，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與平地經濟之間緊密互動，也反映在產業的轉作型態，其中，高山茶區往梨山地區擴展為 1980 年代左右台灣茶產業轉型之後所衍生的效應。換句話說，台灣茶葉發展政策轉而從外銷轉為內銷之後，烏龍茶茶區從平地擴展到山地的原鄉部落，由外銷茶葉到支持本土茶葉，由平地到山地的過程，在高山農業面臨市場的壓力下，原鄉茶產業的發展，連結了山地/平地，茶/原住民，為跨地方的動態過程。

然而，在高山農業轉作的歷程中，茶產業在梨山的萌芽為一個位居經濟邊緣地區迫於與主流社會結合的一個過程。在高度競爭的茶葉市場中，原住民與高山茶的關係不僅反映了高山地區的生計變遷，變動的過程也代表著一個原住民如何

應對市場和外在社會的歷程，人地關係的變遷，可作為對當今對於茶葉市場、高山原住民文化與社會和國家治理之間的回應。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變動同時也提供高山原住民在產業上發展的機會。



在面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為了發展經濟，將山地資源和原住民的勞力納入台灣的社經體系中（廖文生，1984）。山地經濟為了順應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如何將經濟作物有效率的轉變為資本，為山地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因此，在高山茶產業發展的初期，原住民性並沒有彰顯，高山地區的原住民正如同一般農人的角色，其在高山農業面臨的掙扎反而在政府的山地政策中被抹除，而趨於一致，或者隱而不見。

有別於上述國家對於原住民的觀點，實際上梨山原漢之間的高山農業生活卻是混雜的，不太會特別強調彼此的身分。除了市場機制與特殊場合等特定的情境下，原住民性才有機會以接合的方式浮現，此部分的討論將再後續篇章詳述。

第四章 製造「自然」：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

上一章提及高山茶在原鄉部落發展的背景為一個政治經濟過程，高山茶的引入，串起了部落內外不同人、事、物、資金的流動，在回應市場的過程中部落內部的社會關係和土地利用的情形也更為複雜。茶產業的發展看似為部落帶來新的榮景，然而在壯麗的高山茶葉地景的背後，也隱含了一些衝突。當部落裡絕大多數的茶農為平地人，而原住民茶農為相對的少數時，原住民在產茶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其自身的論述並與平地茶農做出區隔？

本章主要以新佳陽部落為例，同時輔以仁愛茶區原住民種茶的案例，分別討論建立在市場機制下，茶產業發展在土地利用、技術與資本的取得、茶葉管理施

作的過程，以及茶產業和部落的關係，說明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日常生活實踐的複雜性，深入地了解茶鄉的全貌。



第一節 原漢合作的茶產業：土地、技術與資本

茶葉生產的過程是一個交織在族群、土地與市場之間的複雜關係。對原住民而言，茶產業發展並不是當茶被引進到部落之後，就可以直接地憑藉先前種植果樹的經驗順利轉作茶樹，相反地，透過其他外力的協助，部落才有機會轉變成新興茶區。因此，原漢茶農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原住民茶農在茶產業的實踐為本節討論的要點。

2014年冬天，初到部落，放眼四周山地盡是一塊接著一塊如拼圖般的茶園，但是讓我深感疑惑的問題是為何在這麼大片的茶園裡，卻沒看到幾戶人家。居民們常開玩笑的說：「路燈比狗多，狗比人多的部落」。於是我獨自人到茶園晃了半天，對於空無一人的田野，深感無奈之時，心想著蔥鬱廣袤的茶園要照顧得好，且在高山多變的氣候環境下做出高品質的茶，想必費了不少功夫（田野筆記，2015.02）。我觀察了一下四周的茶園，仔細一瞧同樣是一大片約兩到三公頃的茶園，在管理上各有差異，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不同茶園有各自的管理者，但自從踏出工寮之後，半個人都沒遇到，這片茶園地景是如何被實踐出來的呢？

直到了2015年的五月春茶季，我才得以見識到「茶鄉」真正的樣貌。採收春茶的時期，新佳陽部落變得熱鬧無比，部落裡除了回山上休息的族人外，絕大多數都是從平地到茶區的茶農、茶師傅、茶商、採茶工與對高山茶感興趣的訪客。因此，要理解茶產業是如何在部落運作，不能單就原住民出發討論原住民在茶產業的實踐，而是要理解茶在什麼樣的關係下，發展成一定規模的產業。茶是漢文化中具有指標性的產業，但在原住民的文化脈絡中對茶葉卻是陌生的。



另外，在生產面上，原住民缺乏了製茶的知識技術和資金，而漢人在此方面較佔優勢，因此，在漢人缺乏生產所需的土地，以及原住民缺乏技術、資金等原困下，原漢之間的互動關係成為了茶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為了釐清原漢關係的互動，我將分析不同類型茶農以說明茶鄉部落組成的複雜性。

部落內的茶農大致可以分為三者，原先在部落內的平地果農，後來轉變為茶農；後來到山上投資的平地製茶師（茶農）；以及後續轉作茶樹的原住民，這三者分別在部落的茶產業上存在著時而緊密，時而疏離的關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高山茶市場的興起，以及前一章提到部落經濟發展面臨衰退的窘境，外來投資者的注入剛好接合了新佳陽茶區運作的條件。

1.原先的平地果農轉為茶農

在新佳陽的平地果農磊哥提到：「像我現在做這個以前都沒人做啊，荒廢掉的土地，要種什麼好，交通又不方便，然後他海拔又特別高，因為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海拔高，海拔高就是種茶最好，所以慢慢現在就是種茶。但是這個當中，從蘋果到茶樹，這個當中所浪費掉的時你(妳)算算，四十年五十年就流失過去了……農民就是打不死的蟑螂，他改種水蜜桃、改雪梨阿、改甜柿阿，搞得一大堆，有些人就是轉種茶、種菜，種茶是最後面。」磊哥不斷的強調著農人為了獲利「追起不追落」¹³的經驗法則，同時也暗自表露自己務農的辛酸。

在部落的二代平地果農—洪阿郎也有類似的經驗。「沒辦法啊!了錢了很多年，只能種這個啦!沒有多少錢可以了啦，你看我們颱風一次來，我們就損失好幾百萬。」阿郎在經營二十幾年的果樹之後轉作茶樹，成為部落內第二為茶農。

¹³ 指的是農人會投機性地搶先市場，選擇有賺頭的作物進行投資。

他之所以會開始轉種茶主要是因為颱風的打擊，每當有颱風的訊息，全家人都會神經緊繃的連夜到山上搶收果樹，只怕剛要結果的雪梨被風雨打落在地，一年的辛苦便化為灰燼。



磊哥和阿郎的務農經驗為大梨山地區農人們的縮影，從他們的言談可得知，轉作並不只是個人的選擇，而是一個高山農業必然的趨勢。儘管果樹的經濟價值不低，但也難防天災的搗亂，農人會有預期心理，會想要種有別於他的高經濟作物，新的經濟作物必須要能夠適應高山地區的環境，以及方便運輸與儲存，因此種茶早已被列為農人轉種的選項，剩下的只差時機與技術問題。

2.陸續到山上投資的平地茶師

如同第三章提到市場上對於高山茶海拔越高，茶葉品質愈好的認知，對於經驗老到的茶農而言，亦是如此，製茶師們（茶農）為了生產高品質的好茶，選擇高海拔的種植環境為首要條件。此外，在茶商的炒作下，不少茶農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開始往高海拔地區尋覓新的茶園。新佳陽也不例外，民國 84 年古邁開始產茶後，曾經到茶廠幫忙的製茶師傅開始對這塊還未被開發為茶園的土地，感到躍躍欲試。這些製茶師（茶農）自南投竹山、鹿谷、信義、杉林溪，以及嘉義奮起湖等地，在其他的「高山茶」區也有二、三十年的經驗，對自己在梨山另闢新茶園產茶充滿信心。

高山獨特環境

製茶師對茶業生產環境的選擇，除了依地理位置、微氣候條件外，也參照其他海拔環境所產的茶葉品質，決定是否在新佳陽進行投資。來自鹿谷的黃老闆之所以會選這塊地是剛好看到「太陽從東北方入射」，又因為「新佳陽位於思源啞口的西南方，海風會從東北方進來」，因此以他種茶三十年的經驗判斷，新佳陽

是很適合種茶的環境。他接著說，若要比較高山茶種植的地區，台灣是一個比大陸還適合種茶的地方。儘管大陸同樣也有高山，但是台灣的條件比大陸好。其理由是：「我們是海島型國家，位在低緯度地區，就算東北季風吹到中國大陸，季風到台灣也多了六度」。也就是說台灣的環境濕度和乾度比較適合茶樹的生長(田野筆記，2015.08.05)。

安哥是來自信義的製茶師(同時也是茶農)，他認為梨山茶和玉山茶不同，梨山茶的優勢在於「海拔愈高，茶葉的滋味愈好、水較軟」，此外，他也認為新佳陽為全台灣海拔最高的茶區，因為茶葉較佳，產量有限，茶葉得以賣得高價錢。儘管在梨山種茶的成本比較高，但是梨山茶的高價可以轉攻高端市場，所以在七年前就來新佳陽種茶(田野筆記，2015.05.07)。環境和位置對於茶農而言是基本的種植條件，但由於梨山地區的部落絕大部分為原住民保留地的範圍，土地的取得便是種茶的一項關鍵。

土地取得

新佳陽部落的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為什麼新佳陽茶區大多是平地茶農在經營呢？以下就幾位到新佳陽茶區投資的茶農和部落族人的經驗進行分析。出身在鹿谷，有製茶三十年經驗的黃老闆，四年前也到新佳陽種茶，黃老闆客氣的說：「朋友介紹的，剛好有空地，所以就來這裡做」。從嘉義奮起湖的茶農－劉大哥，同時也是製茶 20 年的茶師傅，在 7、8 年前到新佳陽協助製茶，後來經由部落族人介紹取得土地。另外，有三十年種茶經驗的安哥提到：「因為那時候有人要租地，所以就來了。」他也是透過和劉大哥相同的管道相繼到新佳陽種茶。

上述不同農人在對茶樹的生長環境、土地的需求，反映當前市場上對高山茶的需求增加，然而，在高海拔的環境土地利用受限制，在外界資本的驅力下，使得部落族人將土地出租給平地茶農，但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會願意出租呢？這

與上一節提到邊緣地區的群體容易受到政治經濟的力量，逐漸地被邊緣化，或是成為更弱勢的一群有關，尤其是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並以經濟作物為其生計來源的農人。

「他們根本就不會種茶，不懂得管理，所以就開始包出去……，種茶是外地人為主。」在鳳凰實驗林山地農場的茶葉師傅說道。

另外，在部落的劉爺爺提到因為自己的管理技術沒有漢人來得有效率，再者由於年紀大了，其子女也沒有意願留在山上務農，最後他將大多數的土地租給別人，自己留一些地種果樹，然後另外一塊包給別人種茶。由於部落中大多數的族人都將土地出租給他人經營，對茶葉的管理和種植較不熟悉，因此每當提起茶葉的話題時，居民們很自然地把焦點帶向喬伊姐，「他們的茶賣得很好，都銷到大陸去呢！」（田野筆記，2016.05.10）。

不論從外來者或是當地原住民的說法，其實表達出原住民在土地經營上的困境。族人們認為九二一地震之後，梨山往台中的交通不便，導致許多包商不願意上來收購，再加上部落內的族人大多到都市求學、打零工，勞動力不足和人口高齡化的問題，使得果樹的生產與銷路都受到打擊。

由於經營果樹效益比梨山其他部落差，不少已在平地置產的族人，決定搬到山下生活。有族人種了三、四十年的果樹，因為山上缺工嚴重，空有的土地自顧不暇，在種種迫不得已的經濟困境下，考慮把地轉給其他人經營，或是將大部分的土地出租，自己則保留一小塊地種果樹。隨著愈來愈多的平地人上山投資茶產業，後續則有少數握有足夠資本的原住民加入轉作的行列，因此部落中呈現的是一個動態且綿密的技術、土地、資金的網絡，藉由原漢之間的關係，部落的地景逐漸地從原本的果樹，逐漸轉作成茶樹。



除了土地外，技術和勞力也是重要的面向，對資本較少的茶農而言，是一大門檻。由於梨山地區位置偏遠且極度缺工，技術和勞力的資源較難取得，不論是平地茶農或是原住民茶農都會請外地的製茶師和採茶工來幫忙，原住民茶農也會和平地茶農交流製茶師或是採茶工的人脈資源。以下就製茶技術和勞力的來源進行說明。

製茶技術的來源與市場通路

技術分成茶園管理、採茶和製茶三部分，在此指的技術為製茶技術。依照烏龍茶的製茶流程，製茶師分為三組，分別是茶菁組、炒茶組、團揉組，其來自於不同的製茶團隊，有些本身是中低海拔的茶農或是製茶師，到了高山茶的採收期時，就會隨製茶團隊上山。

此外，從各地茶區遠道而來製茶師傅除了幫忙製茶外，他們也會向茶農收購部分的茶菁，製成的茶乾自行販售，以茶菁換工資的方式減少茶農的生產成本，同時製茶師可以依照各自的喜好，將換取（或是收購）的茶菁製成特色茶。茶農和製茶師之所以可以如此「互補」，前提是茶農要顧好茶葉的品質，同時製茶師有能力掌握高山多變的微氣候。曾聽一位擔任過產銷班班長的平地茶農提到：「要找到好師傅願意配合你，至少要需要 5 年的時間，要給師父去摸索，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另一位平地茶農也提到：「首先是茶園管理，我們對茶園管理有信心，要把好的茶照顧好給師父做，但是有些師傅會刁難，不論你茶種得好不好，師傅都會嫌」。由技術的流動所帶起的茶產業，在產製過程的變數甚多，茶葉製成為決定新一季的茶是否能如期茶賣出的關鍵¹⁴，而這些壓力卻落在急於回收成

¹⁴ 「依茶葉的發酵程度與茶種的不同，茶葉所製成的風味多變。若依發酵度可分為未發酵、部分發酵和全發酵茶，其中烏龍茶屬於部分發酵茶，梨山的高山茶的發酵度在 15%~35%之間，而中高海拔的烏龍茶發酵度介於 20%~40%之間，發酵度拿捏依製茶師的評斷和消費者喜愛的口感而定」（沈慈雅，2010）。

本茶農身上。因此，對於缺乏製茶技術的茶農而言，尋求製茶師配合的過程充滿著勞資之間角力。



勞動力與資本的競奪

茶園管理平日只需要 2 個人左右就可以管理約 4 公頃的茶園，但是到了採茶時節又不同了。梨山地區因為海拔高度較高，茶葉的生長速度較緩，一年只採春、夏、冬三季茶（福壽山因為海拔高度較高，一年只採兩季茶），所以每到了採茶時節，同一海拔的茶葉已經生長到可以採摘的程度，為了趕在茶葉最好的狀態進行採摘、製作，必須要有足夠的勞動力進行採茶的工作，因此在短時間內的勞動力由其他低海拔茶區的採茶團隊填補。尋找願意配合的採茶團隊對茶農而言是一項挑戰，尤其是春茶產量較大時，時常發生缺工的情形，茶農們為了新茶季的收益，會以加薪的方式競爭採茶工，較無資本的茶農們就會面臨缺工的問題（或因比較晚採茶，影響製茶的時序），因此，為了找到願意配合的採茶團隊，薪資的多寡影響採茶工前來的意願（如表 2）。

以新家陽茶區生產春茶為例，早上五點半天色微亮時，30 位採茶工早已動身前往茶園採茶，採茶團隊的成員組成多元，有來自竹山、鹿谷、阿里山的阿姨、伯伯，也有外配的身影。當採茶班長一聲令下，個個眼明手快地將一心三葉的茶菁迅速地取下，收入繫在腰間的麻袋裡。每 1.5 小時就會聽從班長的指揮排隊，將茶袋卸下來秤種，此外，茶農偶爾會到茶園巡視採茶過程。用過午餐後，重複的動作持續到下午四點才收工。

表 2 梨山茶區採茶、製茶成本比較

	其他平地茶區	梨山茶區
採茶	60	70-100
製茶	100-200	2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單位：元/斤



由於茶葉生產過程中的支薪採現金支出的方式，對尚未回收成本的茶農而言是極大的壓力。絕大多數的農民剛開始轉作茶樹時認為「農民之所以會改種茶是因為有利可圖，因為茶樹相較於果樹，較不怕風」，然而，他們卻忘了考慮到「採茶是有錢人玩的遊戲」（田野筆記，2015.04.09）。根據上述對茶葉生產的理解，平地人除了克服土地取得的限制外，技術和勞動力的取得需要仰賴外界的社會網絡的支援，而對準備放棄果樹產業的原住民而言，其轉作茶樹的門檻更高，尤其是龐大的成本支出和後續在市場端的經營，打退了原住民想要轉作茶樹的動機（田野筆記，2015.04.09）。

在原住民茶產業開始萌芽之後，部落的經濟分工，大多數的勞動力並不完全由外地的工人取代，部分傳統的共享經濟模式（如 gaga）也由過去打獵、祭儀，過渡到茶產業的生產面。例如：為了試做新的茶品，小面積且不定期的採摘需要仰賴部落婦女們的勞動力；又或者有外賓來參觀喬伊的茶廠時，喬伊會請族人們支援外賓食宿的接待。因此，在勞動力方面，並不只有從經濟成本做考量，將社會文化納入生產的模式也是重要的一環。

3.土地作為家或商品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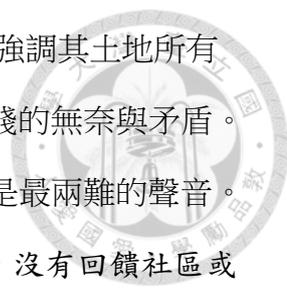
在田野的這段期間，我以古邁茶廠作為觀察新佳陽茶部落內部與外界互動的研究點。其中，凡到假日茶廠偶爾有幾位舊部落或是梨山其他部落的親戚前來拜訪，茶廠頓時成為了部落聚會的場所。在聚會和共食的經驗中，我常藉由吃飯的場合，以「客人」的身分了解部落裡的大小事，也試著以研究者的身分與部落族人交換茶產業和土地的看法。在多次的聚會中，土地紛爭常常是茶餘飯後的話題，儘管檯面上保持和平，但有時候私底下還是會起一些小爭執。

正如我第一次踏入田野時，我的主要報導人喬伊和另一位在地方上有聲望的報導人很氣憤地跟我說：「你們可以幫我們原住民賣農產品嗎？錢都被漢人賺走了，他們都不會回饋鄉里！」簡短的對話中，道出了族群之間的摩擦，以及對原住民土地政策實行的無奈。由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¹⁵規定原住民保留地不能買賣的限制，大部分的平地人和原住民之間採「合作」或是「共同經營」的模式。也就是說，藉由原住民出租地上權，平地人繳交租金的方式，使資本的流動延續了茶園地景的生產，解決了部落族人的經濟危機，並讓位於邊境部落繼續發展。但是，當新的產業型態是建立在將土地使用建立在市場機制上時，原漢之間的偏見和衝突的言語在山上時有所聞。

在某一個晚餐的場合，眾人小酌幾杯後就開始對土地的事情議論起來了。族人開始批評某位平地茶農，不準時繳租，地主大罵：「他以為他是誰啊！把土地當作自己家啊！」在場所指責的平地茶農，原來從事果樹產業後來因為天災的影響，賠了不少錢，轉作茶樹約十年後，因為茶葉的通路打出知名度，家業漸有起色後，整個人也開始「驕傲」起來。但是在部落族人的眼中，卻是難以合作的對象。

在田野中時常聽到與土地相關的紛爭，以及對平地承租者的怨懟，這部分族人大多不願主動提起，只有在茶餘飯後以族語參雜著國語討論，因此，此部分我只能得到一些蛛絲馬跡的訊息。但就經濟的角度思考，假若雙方簽訂二十年的合約，當平地茶農在高租金的情況下還可以維持生計，表示種植茶樹的利潤遠勝果樹。當茶樹開始轉虧為盈的時候，地主有時候也會視情況調漲地租，因此雙方有時就會言語相向。

¹⁵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全，除繼承或贈與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承租。



「把土地當作自己家」，一方面就法理上以原住民的身分強調其土地所有權，另一方面也說明其因經濟因素與土地脫離，拱手讓外人賺錢的無奈與矛盾。土地商品化引起的紛爭與偏見往往是我在山上聽到最刺耳，也是最兩難的聲音。原住民會抱怨：「外地人拼命的利用土地賺錢，都把錢賺走了，沒有回饋社區或梨山，而我們想要發展卻又受到限制。」（田野筆記，2015.07.14）。然而，有些漢人則回應：「他們就是懶惰啊！他們不懂的理財！」。上述對於原漢之間的刻板印象或是抱怨，顯示土地商品化在茶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衍伸出原漢之間的隔閡。原漢彼此的關係除了反映在雙方的言談外，反映在茶園管理的過程中。

除了部落內部的土地紛爭外，也曾有外資想要一口氣賣斷部落生產茶菁，但是後來經過族人們討論之後，決定留守自己的土地。「如果說一年有 400 萬，簽十年的合約，也是一大筆數字啊……有人不願意放手，有人很容易受誘惑。但是說難聽一點，山上的人大多都搬下山了，反而是平地人上山耕作。」一位常跑展場和新佳陽部落的泡茶師說道。的確，當大批茶商炒作下，能夠捍衛自己對土地的觀點，留在自家的土地上耕耘的族人屈指可數。當大多數的茶園都是平地人經營的情形，也間接地影響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

比起其他的高山茶區，新佳陽茶區的坡度較陡，茶農的平均種植面積較小，因此在茶葉的生產過程中採用精緻化的管理，因此，不論在下肥、用藥和採茶時都十分地講究。在高度競爭的情勢下，原漢茶農表面間看似相合甚好，然而在茶業產製上，彼此間存在著競爭的心態。其中，由於平地人在生產成本上，需額外付出大量的租金，在為了兼顧茶葉產量和成本，會使用較不自然的方式管理茶園。茶師接著說，「有些茶農會額外的施打葉面肥，增加茶葉的芽點，讓茶葉變得又油又亮，但是相對的茶樹會減壽，產量看似增加了，但茶質不一定好。」因

此，當得知平地茶農的做法之後，原住民茶農也不甘示弱地為自己爭一口氣，希望在兼顧生態永續的前提下，種出好茶。



在茶園管理方面，原漢茶農在農閒時彼此觀摩茶園，觀察茶園生態、撫摸茶葉和耕地管理的方法，比較茶葉的品質。當新茶季到來，也會試泡彼此的茶，以鑑別製茶師傅們在製茶手藝上的差異。因此，原漢雙方在茶產業上，發展出彼此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也顯現出茶鄉部落的發展，並不只有原住民在茶產業的實踐，而是原漢之間互動的結果。

總歸來說，茶產業的發展並不只有茶在原鄉生根之後，就可以順利的運作，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不同的平地技術、勞力等要素的配合，才有機會轉變成新興茶區。在彼此競合的關係中，茶葉的品質也同步精進。在技術方面，由於大多都是平地的勞動力填補，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不大，不過在茶園管理的方面，因為原漢茶農對土地的態度不同，影響其在茶園管理的實踐。

個人

第二節 何謂「原味」：原住民在茶園管理的實踐

綜合茶農、製茶師和茶商們的說法，茶葉製成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環環相扣，從茶園管理、採摘和製作都是一門藝術。換句話說，茶園管理的方法和茶葉的製程同樣的重要，最終呈現的結果會影響到茶湯的色澤和味道。因此，茶園管理是否得宜，將會是出產好茶的基本門檻。

此外，在近年茶葉的食安事件頻傳，農委會除了加強茶樣抽驗的措施外，茶農們為了信譽也開始嘗試以生態、無毒的方法種植，藉由生態、無毒等友善環境的論述為茶葉增值。由於高山茶的生產成本甚高，若要轉作為無毒有機的茶葉需要付出更多的生產成本，當茶葉市場轉向無毒、生態的訴求時，原住民如何順勢的與茶葉市場接合，並進一步的生產出一套產茶的論述？以下以不同的原住民在茶產業的實踐，以說明「自然」茶葉生產的複雜性。

1. 返鄉青年種出具有「部落靈魂」的茶

因為我們是當地的泰雅族人，從父母輩祖先那邊已經給我們一個就是愛護土地的一個很強烈的想法，所以我們對於如何照顧我們的植物呢，有一個很大的使命在！

—摘錄自 2016TGA 食在實在台灣味！發表會影片

喬伊姐是泰雅二代的返鄉青年，先前在台北的大公司擔任採購員，但因為種茶的父親過世，所以出於情感的因素，毅然決然地回到山上，擔起家中茶園經營的重責大任。才回家接手五年的她，對茶園管理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做出來的茶在梨山地區小有名氣。

我回來的時候整天待在茶園裡不敢走，我就這樣望著它，望它兩個月，一直在想說它會不會跟我講話，或是我該怎麼對待它？後來我覺得這樣是不可以的，要找出種植的方法。從農會和茶改場那邊知道一些種植的課程，那兩年幾乎很密集上課一直在學習這樣。（2015.02.05，田野筆記）

對喬伊姐而言，做出好茶的關鍵與茶園管理脫不了關係。農藥的使用、施肥和剪枝都是茶園管理的一環，其中她最有體悟的是農藥使用。我曾和茶農們討論

茶葉用藥的事情，包括喬伊姐在內的農人的都表示以前在梨山買農藥時，因為路上的店家大多是熟識的人，有時可以賒帳，但是後來平地人上山之後，就不太能賒帳。當外來的農藥商進來只想要牟利，農藥商還會推薦果樹、菜類和茶葉的農藥，假若沒有正確的用藥知識，很容易因為農藥商的誤導，而破壞了原有的土地，她說：「以前都不懂啊！自己的土地要自己顧，不要傻傻地被農藥商騙了。」。

喬伊姐認為，盡可能地不灑農藥是最好的做法，因為除了農藥檢測機制較以往嚴格的原因外，灑農藥對小農而言也是成本。喬伊姐也深知噴灑農藥對環境的副作用，為了瞭解用藥知識，喬伊姐特別去中興大學進修，跳脫了以往農業資材行建議的用藥方法，反而主動地學習用藥知識。（2015.01.31 田野筆記）。

以前嘗試過堅持不打藥，但是蟲害會很多，蟲害多的時候，其他客人也會挑茶。後來懂得用藥知識之後，也抓到打藥和蟲之間的生態平衡，所以現在什麼蟲害都知道了。（2016.07.25，田野筆記）

但是打藥也是有原則的。為了確保茶葉可以通過農藥的檢驗，在打藥之後需要推算茶葉藥性的衰退期，大多數的茶農為了以防萬一，都會將藥性的衰退期延長至 5 到 7 天。但對她而言，僅有推算農藥藥效的衰退期還不夠，喬伊姐特別帶我到茶廠附近的人工蜂窩，觀察蜜蜂成長的狀況，藉此判斷茶園周遭是否有過多的農藥殘留，或者監測茶園內有無從其他果園飄散過來的農藥產生隔離汙染的問題。

除了採用喬伊所謂的「生態農法」種茶之外，從茶園周遭的設施，也可以看得出茶園主人對土地的別出心裁。走在部落的小路間，可以明顯的發現喬伊姐的茶園和其他茶園不同的地方是，茶園的邊坡種了不少的樹，這些樹大多是小株的

山櫻花。在喬伊姐和她母親的想像中，山櫻花除了兼具美觀作用之外，亦有保持水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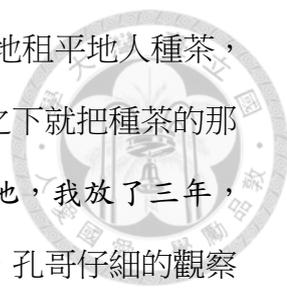


為了延續父親所留下的二十多年的茶園，她認為有必要從茶園管理進行生態的、順應自然的管理方法，才能維繫茶園的永續經營。因此喬伊姐從茶葉實踐上，產生對土地的認同。這份認同來自於對土地的重新認識，從下肥料、不清楚用藥的知識，到最後秉持「生態茶園」的理念，在對外詮釋茶園管理的過程中，喬伊姐彷彿變成了生態茶代言人。喬伊姐的所有的行動和解說的背後，是一套其對土地永續經營的理念。這份理念到後來成為了茶產業行銷的一環，此部分有待下章分曉。

2.意外製造的「自然茶」

除了梨山茶區外，仁愛茶區的原住民也陸續改採生態農法的方式種茶。願意嘗試的原住民是少數，不過要求每一位原住民都改用生態農法的方式種茶可能會引發爭議，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茶葉產量低、茶葉被蟲咬傷的而影響茶葉外觀的擔憂。

第一位在廬山部落種有機茶的是孔哥，孔哥是部落裡的靈魂人物，曾經擔任過茶業產銷班的班長、里長、推動部落觀光發展的負責人，頭銜甚多，他很得意地將他的茶命名為「自然茶」。孔哥之所以會生產自然茶是在一次的機緣下開始的，以前茶葉景氣較好的時候，由茶農和茶販各自議價，將茶葉賣出，但是到後期因為茶葉的銷售量不如以往，不少茶農為了趕緊回收成本，將茶葉的訂價降低而打壞了行情，孔哥認為部分茶農在沒有考慮到茶葉成本的現實面，不斷的付出卻沒有賺回本錢，很容易吃虧。因此，不少人將土地租給平地人或是轉作。



「沒有能力的人會把土地租出去。」孔哥曾經把一部分的土地租平地人種茶，另一部分平的改種菜，但是平地人把種茶的土地搞砸了，一氣之下就把種茶的那塊地收回來，並採取放任的方式管理。「我先不下肥，先不管他，我放了三年，三年都沒收入，後來放了一兩年，之後發現茶樹好像有恢復」，孔哥仔細的觀察茶樹生長的狀況，並等到樹勢較成熟後才進行人工除草的工作，將除下來雜草當作自然肥。待下一次雜草叢生的時，孔哥也不擔心茶葉蟲害的問題。孔哥認為這是「自然茶」栽培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在茶樹復原的期間，他意外地發現適時的除草、不噴灑農藥和額外施肥，大自然會給予回饋。

上述是孔哥自己在經營「自然茶」原初的經驗，他將種植「自然茶」的經驗視為一種自己理解土地的體認，然而實際上「自然茶」是如何「復活」的，孔哥自己並不清楚。直到在南投魚池茶業改良場進修時，孔哥才理解到茶樹之所以和可以雜草共生是因為生物鏈的道理。茶樹之所以不被害蟲侵襲，是因為雜草內同時存在著害蟲的天敵，也就是說，「茶蟲和草蟲是相剋的」。三年多來，孔哥憑藉著回復土地的理念，堅持不噴農藥的作法，讓原本奄奄一息的茶園有了新的轉機，藉由理解茶園生態的運作，孔哥對自己所創的「自然茶」更有信心。

近幾年市場上對有機茶的需求增加，有機通路的茶商找上孔哥的「自然茶」，但在追求市場價值、品質與產量的權衡之下，孔哥採用「自然」的種植方式也產生了轉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機通路商開始向孔哥推薦新的無毒配方，例如：將土壤、雜草和蜜糖混和成「天然的肥料」，以增加茶樹的養分，讓孔哥躍躍欲試。另外，採用自然農法的茶園管理，茶產量較少，為了增加茶葉的產量，合作商建議孔哥先不急著修剪茶葉，因為待茶樹長到肩膀的高度時，茶樹會長出旁枝，旁枝會吐出新的側芽，以增加茶葉的產量。孔哥驕傲地說著第一次種了 1 萬棵茶苗，最後存活的只有 500 棵，這 500 棵茶樹第一次收成只有 200 多斤，在

試用新的方法後，第二年的產量增加到 267 斤。從孔哥的案例中我們可以得知，「自然茶」是孔哥嘗試不同技術和實驗中所得到的結果，其為一個農法變動的過程，擺盪在其對土地的關懷和茶葉市場之間。



3.調適中的「原味茶」

當茶葉市場開始強調無毒、安全的產品時，也影響原住民調整茶園管理，然而，並不是每位原住民茶農都能適應新的農法。今年六十幾歲，世居在巴壟部落的虎哥就是其中一個正在「調適」農法的案例。虎哥是仁愛鄉第一批被送到楊梅茶業改良場受訓的茶農。自受訓回來之後，秉持著自己的作法開始管理八分地的茶園，對自己種茶和製茶特別有信心。

隨著市場上對茶葉安全的要求，在用藥上要特別的注意外，用打藥施肥也是生產成本之一，如果能夠掌握茶葉用藥和施肥的細節，對小茶戶而言可以創造生產安全茶葉和降低生產成本的雙贏。但是上述的作法，對實行「舊式」茶園管理三十年的虎哥而言，轉變農法是一個無聲的掙扎。

時常在務農的虎哥缺乏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修茶葉課程和行銷，因此，在銷售和管理的部分交由平地人汪哥負責。幫虎哥管理茶園收支的汪哥也提到「虎哥管理的程序是三十年前的種茶方法，每次我跟他建議他會有點不開心……，我都會跟他說不要太常噴藥，如果必要的話打一種藥就好。」汪哥也會告知茶農不需要過度施肥，適量的施肥即可讓茶樹穩定的生長，也可以減少生產成本。

為了達到利潤最大化，汪哥下一個目標是控制土壤的成分，調整茶葉的生長速度。這些茶園管理的新知都是平地人從茶業改良場的研習，以及從其他有經驗的茶農習得的，但是對於虎哥而言，需要一段調適期，尤其當因為減少打藥和施

肥的正常工序後，無法接受茶葉產量不增反減，以及茶葉在吐新芽時遭蟲害的慘況。儘管如此，基於對土地的熱愛，以及為了能夠符合市場需求的茶，虎哥還是接受了生產無毒茶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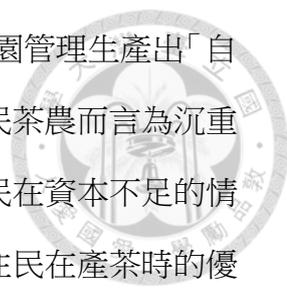


老一輩的茶農在農法調適的過程中，並不是一開始就能接受新式的茶園管理方法。然而在茶葉的食安危機後，虎哥更意識到生產無毒茶葉的重要性。虎哥的茶以「自然」、「原味」為名在網站上行銷，但是所謂的「自然」、「原味」的背後是一連串掙扎與轉換的過程。另外，從虎哥在農法的調適案例，以及前兩者原住民茶農對於無毒茶葉的論述，所謂的「生態」、「自然」與原住民的關係並不能輕易畫上等號，其中還有市場、知識與土地認同等更複雜的關係。

第三節 跨界嘗試的滋味

本章最主要從原住民在茶業生產的角度，重新思考原鄉茶葉生產實踐的複雜性。承接第三章高山茶在原鄉發展的背景，在轉作茶樹之後，實際上在部落內的茶農絕大多數為平地人，僅有少數的原住民從事茶產業。茶並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那原住民如何在茶產業上與平地茶農進行劃分？

在茶葉市場的競爭下，原鄉部落的茶葉發展實為一組動態複雜的關係。諸如在土地承租的關係上，延伸原住民茶農和平地茶農在茶產業實踐的差異。例如：雙方在茶產業生產的「競合關係」上，產生了將土地視為家或是商品的矛盾，以及原漢之間在土地使用的衝突，除了再度切割原漢之間的二元關係，其同時也因為彼此競合的關係促成了茶產業的發展。



另外，當茶葉市場轉向無毒、有機的消費時，不同茶農在茶園管理生產出「自然」的論述。例如：在缺乏資本的情況下，施肥和打藥對原住民茶農而言為沉重的生產成本，但是當茶葉市場講求無毒、自然的茶飲時，原住民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無毒、自然農法等低成本的茶園管理方式，反而成為原住民在產茶時的優勢。因此，所謂的自然、生態的論述為市場機制下所創造出的價值與意義，茶農可以透過市場的運作，論述其茶葉的價值（Writer，2016）。

在本章的第二節，我進一步的對原住民相對比較自然、生態的說法，提出不同的觀點。原住民茶農為了與平地茶農在茶業市場上做出區隔，挪用自身在傳統農耕「不打藥」、「遵循傳統」的認知，論述茶葉「自然」、「生態」的特質，與主流的茶葉市場接合，使其生產的茶葉更容易被市場接受。然而，對原住民抱有浪漫化懷想的觀點需要再次的檢視（陳毅峰，2009）。換言之，在茶葉市場的運作下，所謂的「自然」、「生態」說法為科學知識的農法和原住民在土地上實踐傳統農法等複雜關係下裝配的產物，其同時也是國家與地方之間不同尺度作用的過程。

從上述案例的分析中，我得到有別與過去原住民在經濟調適的研究的見解，也就是過去的研究認為，外來制度和經濟作物對原住民的社會文化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然而，我認為茶產業的引入，雖然間接地排除部分的族人在部落深耕的機會，但其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原鄉部落轉變的契機。換言之，經濟作物的引入並非全然為部落帶來負面的影響，反而成為一股轉變的驅力，再次地建構原住民對土地與身分的認同，而這股驅力並非固守在部落中，而是跨地方實踐的結果。

奠基於本章對原住民如何藉由茶產業的日常生活實踐，形成一套他們如何論述茶葉的討論，在下一章，我將從茶葉銷售的角度說明特定場合展現原住民性的過程。

第五章 原住民性的浮現：原住民性對外展演與認同的 凝聚



延續第三章對高山農業茶產業發展的脈絡，以及第四章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日常生活實踐，我所論述的是原住民之所以有所不同，並不是單純來自族群的差異，而是有趣地在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透過茶葉這項經濟作物，形塑出族群的邊界。同樣地，本章將從原住民性如何在變動的茶葉市場、不同族群、展場空間中浮現，並說明其中複雜的政治性。

從展演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在茶產業展售，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本土的寓意。隨著國家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在 2000 年政黨輪替，「新夥伴關係」條約簽訂之後，後續原住民相關的運動逐漸在社會中獲得高度的重視（紀駿傑，2005）。然而，在台灣以漢民族為主要族群的社會中，原住民被視為國家認同的標籤，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加深了原住民之於本土的關聯性（洪泉湖，2003）。然而，就政治生態學的觀點，再現原住民的樣貌為一種本質化的策略，其內部存在著衝突、複雜性與變動性（Tsing,1999）。因此，與原住民相關的刻板印象須要加以檢視。

茶並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是當原住民在大型的展售平台和面對媒體時，該如何自處？接下來將討論當茶葉產銷系統的轉變時，原住民回應茶葉市場對於本土茶葉的焦慮時，其如何跳脫部落的尺度，並運用其自身的元素與更廣大的社群連結。

第一節 全球化下台灣茶產業的挑戰



第三章提及台灣茶產業的轉型歷程，早期台灣茶產業以出口導向為主，以企業化的模式經營，但是到了 1980 年之後政策上無預警的轉變，使得台灣茶產業轉向內銷市場，同時，政府也解除了製茶許可的限制，國內自產自銷的茶農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此，有別於國外的茶園採大規模的管理，台灣的茶產業屬於家庭式的精緻產業。然而，當台灣茶業面臨進口茶葉的威脅時，本土茶農不免受到進口茶葉的打壓。在進口茶葉發生混茶事件後，社會氛圍加深了台灣茶本土性的論述。台灣茶葉市場從外銷轉為內銷之後，台灣茶的價值和生產成本大幅的提升，國內開始出現高低海拔的茶葉混充的現象，然而在越南茶事件之後，國內市場對茶葉本真性的焦慮受到重視（陳宇翔，2007）。

另一方面，從茶葉出口的角度思考，台灣茶出口到國外時，也因為識別度不足，常發生產地商標被竊用或是與其他茶葉混充的情形。不論是進口茶葉對台灣本土茶造成的產業衝擊，或是台灣茶出口到國外面臨被混充的情形，這些現象皆說明了台灣茶的產量少，生產成本高。因此，台灣的茶產業在面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時，急於確認所謂的本土茶。本節將進一步說明這台灣茶的本土性與原住民在台灣被視為自然、本土的標籤，這兩組關係如何在提倡本土茶葉論述的市場中被接受。

「混茶」與食安議題

混茶是配茶技術一環，為了要求茶葉味道一致的口感和品質，會將不同的茶葉調配成同一種味道再統一售出（廖慶樑，2010:182）。然而，當台灣茶業的進口量大於出口量時，為了滿足國內對茶葉的需求，必須由進口茶葉填補。例如：農委會楊梅茶改場場長陳國任曾在報導中指出：「台灣的需要量大概在 4 萬多

公噸，那我們生產大概在 1 萬多公噸，所以我們大概有 3 萬公噸的茶葉，必須靠進口來補充。」¹⁶混茶的結果隱含著茶葉農藥超標的風險，混茶的技術在台灣的茶葉市場中，由過去維持茶葉品質的技術轉變成負面的意象。隨著工商業快速的發展，生產成本的提高，茶產業也面臨了更嚴厲的競爭，自產自銷的茶農們也提到部分不肖業者為了調配出高山茶的味道，會將中低海拔的茶與高海拔的茶混合拼配售出，在此，混茶技術成了降低成本考量的手段。然而，這樣的結果有可能發生茶葉用藥檢出的風險（田野筆記，2015.02.05）。當市場開始講求無毒、自然的茶葉時，高山茶往往成為眾矢之的。

除了國內的混茶事件之外，早期進口的泰國茶充當阿里山茶，直到近期進口越南茶流入到飲料茶市場，或是混茶作為高山茶拼配原料的訊息（廖慶樑，2010），引起國內國人對於茶飲安全的恐慌，同時也對國內本土茶感到一股焦慮¹⁷。將焦點轉回梨山地區的茶農，當茶葉產地劃界的現象愈趨明顯，回應本土化遭受衝擊的困境，政府如何推新解方？原住民茶農又是如何尋求新的市場出路？由於梨山茶的價格相對較高，因而對產地的名聲造成影響。

為了鞏固高山茶的意象，梨山茶農們進而組成茶葉生產合作社，並成立自有品牌，進行自產自銷的策略。接下來，我將以合作成員中的古邁茶園，以及仁愛鄉某原住民合作社所主導的茶葉品牌為例，說明當茶農面臨行銷的困境時，原住民茶農如何進一步的重新思考自身作為原住民的位置，並再一次的將其文化、土地的精神再現於茶葉市場中，以及其在過程中遇到的困境與矛盾。

¹⁶ 農委會楊梅茶改場場長陳國任曾在報導中指出：「台灣的需要量大概在 4 萬多公噸，那我們生產大概在 1 萬多公噸，所以我們大概有 3 萬公噸的茶葉，必須靠進口來補充。」（來源：TVBS 新聞網 <http://news.tvbs.com.tw/life/579953>）

¹⁷ 潘美玲（2015 年 6 月）。茶知錄-混茶疑雲 打開進口茶與食安的黑盒子。*經典雜誌*，203 期。取自：<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28168>。另外，廖慶樑也提及「進口的越南茶葉除了作為上述廉價罐裝飲料茶原料外，有部分不肖茶商、茶農進口之後，混充國產的台灣茶半球型包種茶，以高價出售嚴重打擊台灣本土茶葉。」（廖慶樑，2010:34）。



如何重新進入市場 – 以梨山古邁茶園和仁愛巴壟茶為例

茶葉混充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中高海拔的山區。隨著茶區的轉移，仁愛茶區從 68 年天仁集團到霧社推廣高山茶，並和當地的賽德克族人收購茶菁，由於天仁集團在高山茶葉市場的名氣廣播，帶動了霧社地區的茶業發展，連帶地，在民國 75~76 年左右不少的賽德克族人也自行投入茶產業的行列，茶產業的景氣從民國 73 年延續到民國 90 年左右。有 30 年製茶經驗的孔哥感嘆道：

[民國 70 年左右]那時候光是收茶菁一斤就收 500 元，現在則是一斤 180 元。以前是茶還沒有做好，就有很多的茶販在門口等試喝，現在的問題是[客戶]不來，只有少數的老客戶才會來……有的時候茶販會故意晚一點來收茶，希望可以趁機殺價，因為他們看中有些茶農急著讓現金周轉，所以就只要能把茶賣出去就好，可惜他們賣的價錢不敷成本（田野筆記，2016.05）。

可惜因為茶區老化，因此茶農們特地重新翻地種新茶樹，但是許多的顧客一窩蜂地往高山的新茶區找茶，認為新茶區的茶比較好喝，許多人就不買霧社的茶，就算有種新的茶樹，但是鮮有人知（田野筆記，2016.02）。

霧社茶區較以往落寞很多，負責茶葉行銷的孝全（化名）和賽德克製茶師志明（化名）說除了受到新興茶區的影響外，另一個影響是受到越南茶的打擊，認為進口的越南茶破壞了台灣高山茶的名譽，使得消費者對高山茶的品質存有疑慮，影響其銷售量。種種對銷售不利的因素，使得族人聯合起來成立原住民茶葉生產合作社，打造合作社的品牌並對外推廣。

成立合作社打品牌的做法已經晚別人很多拍了，因為外面的茶行早已有合作的對象，所以現在只能看哪裡有茶展就往哪邊去。（田野筆記，2016.02）



品牌化經營並進行自產自銷已是茶農們必須面對的趨勢，同樣的困境也發生在梨山新佳陽茶區的古邁茶園。由於梨山茶在台灣的名氣高，價格不斐，在民國80年左右開始有專人到山上收購梨山茶。與霧社茶區相同的是，高山茶的產量有限，不少茶商會直接到茶廠大量採購茶乾，因此，對茶農而言，銷售並不是太大的問題。但是，喬伊姊接著說：「以前茶葉的價格比較高，收茶的人不多，但是後來來了一批[茶農]來插旗的，價格就不一樣了。」後續到部落種茶的人也多了，上山收購茶的人也增加不少，因此現今的茶葉價錢沒有以前高，茶農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

為了將茶葉賣得好價格，喬伊姊曾嘗試將茶葉賣到國外市場，起初他以小三通的方式，藉由經銷商的接洽，將茶賣到中國大陸。喬伊姊接者說：「當初是一個契機，我因為有銷中國大陸，因為用的是公版的包裝，因為公版可以裝很多種茶，所以我的茶到那裡就被淹沒，所以我的經銷商就跟我說這樣不行……因為那時候不懂，因為我們以前是從批發起家的嘛，所以就想說就是做最上游，後來到了中國大陸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說如果要賣零售就不可以這樣子。」

由於梨山茶的品質良好，相對地其生產成本較高，可惜在行銷上沒有特別把關，大多數的梨山茶到了中盤商的手上即被轉手售出，使得梨山茶無法在市場上凸顯其特色，藉由經銷商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高山茶，變成了混充的對象，台灣茶的形象，並無受到重視。面對行銷的困境，茶農們除了梨山茶道協會以推廣梨山茶之外，茶農們也一致地認為，為了避免成為被混充的對象，必須積極的建立自

己的品牌。因此，為了在不被不肖商人剝削的前提下自產自銷，喬伊姊接受了朋友的建議，加入由農委會在民國 93 年提出的 TGA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計畫¹⁸的行列。



包裝好農，品牌台灣計畫

為了回應農業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以及近年來的食安問題，農委會在民國 93 年推出了「改善外銷農產品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計畫，並藉由輔導計畫建立 TGA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的品牌識別，透過業者與設計公司的媒合與輔導，協助業者品牌加值、農產品精品化，以及創意的視覺設計，強化台灣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換句話說，如果要成功地將台灣特色農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除了產品品質的要求¹⁹外，也強調該產品於台灣之間的連結性。

喬伊姊成為受輔導業者的一員，並藉由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專案的媒合展開新的合作關係。103 年的暑假，設計公司一行人前往新佳陽部落進行實地勘查，藉由喬伊姊的安排，設計團隊的成員分別針對茶農和部落的族人進行訪談，此外

¹⁸根據 TGA 的申請書的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強化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特此以『外銷農產品品牌輔導專案管理』計畫（簡稱 TGA），協助國內具農產品外銷實績之出口廠商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塑造臺灣農產品品質優良與安全健康之形象，進而提高外銷產量。」此外「自 99 年起，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受農委會委託，以 TGA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計畫形象，在品牌打造過程中擔任專案管理的重要角色，提供設計、品牌行銷的專業建議。」（取自：行政院農委會 http://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hot&id=6636。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http://www.tdc.org.tw/>）

¹⁹欲申請 TGA 計畫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1.從事農委會「農產品外銷績優廠商表揚作業要點」所訂稻米、蔬菜及其製品、水果 及其製品、花卉及其種苗、茶葉、魚類及其製品、軟體類、甲殼類及其製品、水產種苗 及觀賞魚、畜產品及其製品、禽產品及其製品等十類農產品出口業務，且具外銷出口實績之業者。2. 亟需建立品牌形象及產品改包裝設計之外銷出口業者。本案之輔導對象必須為近三年未曾接受輔導，且主要出口產品需具吉園圃、CAS（優良農產品標章）、OTAP（有機農產 品驗證標章）、TAP（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海宴標章、HACCP 認證或 ISO 標章之一者為優先。」（來源：行政院農委會 105 年度 TGA 計畫申請書）

設計公司另外針對訪談資料特定詞彙出現的頻率，從中抽取足以代表梨山茶，以及具有部落意象和泰雅文化特色的符號、故事，最後結合了喬伊姊經營茶園的理念，重新定位品牌的視覺形象（如圖 2、圖 3、圖 4）。



圖 2&圖 3 產品包裝分別獲得 2014 年德國 IF 包裝設計大獎，以及 2015 年 OTOP 設計獎
圖片來源：取自古邁茶園官網



圖 4 台北食品展上茶葉包裝呈現出自然，與產地連結的意象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產品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此，對設計師來說原住民和茶園地景等重要的元素正是賣點。藉由農產品的包裝，加強了產品和產地之間的連結，包裝所

再現的傳統文化特質和具有地方意象的元素，訴說著茶園的生態故事²⁰。在此，我要說的不只是一個原住民茶農與設計公司合作所展現的結果，還有在品牌打造背後意識形態的建構。透過原漢之間的合作，設計師擷取與原住民文化和相關故事做為產品的包裝，正好符合當今對原住民的自然意象。

實際上，對於生態、自然意象的建構，並不是如大眾想像中的簡化、浪漫。以 TGA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產品識別為出發點，在設計公司和業者的期待下，農產品的屬性一方面接合了地方的特色，另一方面連結了台灣的意象，既本土又國際的產品包裝，使得產品更廣為人知，同時消費者透過茶認識原住民的文化的同時，原住民可以藉由茶說故事。透過茶葉展場，連結人、土地與地景，淡化了以往以圖騰包裝，強化自然、生態的意象。

第二節 再現的原住民性：茶葉通路的契機

為了回應當前對於食物安全的焦慮，另類農食的推廣在近幾年食物消費市場變得炙手可熱。不意外地，在茶展上也可見到各式強調安全、無毒的茶品，反映消費者和商家對食安議題的重視。恰巧的是，回應市面上對於無毒、自然食品的需求，原住民所販售的農產品有別於過去品質較差或的刻板印象，開始被廣為接受²¹，其中較有能力與外界進行連結的族人，甚至成為凝聚部落或是族群內部的經濟與文化意識。

大型展售場合 – 藉由不同空間與包裝陳述我們是誰

²⁰負責策展的設計師在做設計的之前，有去部落訪問耆老，並得知泰雅族神話之鳥，叫做希力克鳥。此外，他將神鳥、水鹿和台灣黑熊的形貌作為背景，再配上古邁茶園的景觀和原住民意象相關的拼貼式塗鴉（田野筆記，2016.06.23）。

²¹ 報導人文德曾提及，以往消費者認為原住民所販售的農產品為次級品，購買意願不高，但在近年來，他也觀察到原住民農產品在市場上廣為接受。（田野筆記，2016.02.17）



1.原住民觀光季成果展

部落觀光為他者對異質文化的想像，因此對消費者和原住民業者而言，兩者之間存在著將原住民本質化的思考。自民國 103 年起，交通部觀光局陸續在誠品松菸園區和台北車站的廣場舉辦原住民觀光成果展，梨山地區屬於參山國家風景區其中的一環，因此在梨山遊客中心服務的泰雅人也一同到場，將部落的「原味」風情帶到都市中的文化空間。

根據我連續參加三年活動的觀察，展場中與原住民相關的元素和特質被強調的趨勢。在活動開始的第一年，在空間配置上，梨山歸屬於參山國家風景區，因此在參山國家風景處的規劃上，梨山、八卦山和獅頭山三組人馬共用一個攤位，到了第三年，三個單位也是共用一個攤位，不同的是，八卦山和獅頭山風景區並沒有特別主打農產品，這部分反而是梨山較占優勢，在梨山的觀光看板上，呈現了梨山地區四個泰雅族部落的人文概況，以及溫帶水果和高山茶的簡介，讓遊客更清楚地知道梨山地區的特產和風土民情。

循著傳統歌舞的樂曲步入會場，在一陣歡騰的氣氛中，讓我感興趣的是，在都市的展場中看到山上認識的原住民朋友，讓人產生了一種時空錯置的感覺。我之所以對展場內的氛圍產生「錯覺」，是因為展場上，看見先前幾位在梨山的報導人，熱心地招呼客人，販售水果和茶葉，讓我聯想到在山上的田野，然而不同的是，在市中心的展售空間與梨山的日常生活存在著差異性。在梨山這個由政策和經濟力所形構的地方，可以自成一套生活體系，對喬伊姐和其他族人而言在梨山，原住民、漢人其實是有很多日常互動，且可能不會特別強調彼此身分的。

然而，在展場中，為了配合主辦單位的要求以辨識身分，他們穿上傳統服飾，以及將工藝師親手編織的傳統布巾作為擺飾，各色的紋路和樣式讓人目不暇給，而這樣的行為和在梨山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落差（如圖 5）。



圖 5 在原住民觀光元年成果展會場中，原住民茶農與外國觀光客的茶席互動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這個差異正好回應了我第一次在田野中的觀察。在第一年參展的時候，喬伊姊很幸運地受邀到原住民觀光成果展賣茶，但她也對主辦單位的要求感到不知所措，「主辦單位還要求我要穿上傳統服飾，對呀，我是原住民，為什麼他們還要求我穿上原住民的服飾呢？」她說。然而，實際上到了會場，很明顯地觀察到大多數的工作人員幾乎都穿上了傳統服飾，言行舉止悠遊自若，但是，在原住民觀光成果展上，對身分認同感到尷尬的莫過於身穿傳統服飾平地工作人員了。協助參展的工作人員主動向我開玩笑地說道：「這裡有很多台灣的原住民，他們還問我說你是哪一族，我只好說我是假梨山人」。從上述的案例中，可以發現到國家如何理解原住民跟當地的族群互動是有所差異的。

此外，根據我在展場的觀察，對原住民而言，成果展場合是認識新朋友和交流觀光成果的平台，茶葉的行銷為其次。然而，對其他的觀光客而言，在偌大的展場空間中，來自各地的原鄉展售櫃上，不外乎販售花東的有機米、小米、芋頭、烤肉、溫帶水果、傳統的工藝品以及相關的文創小物，其中「茶」便成為與其他族群區隔的方式，更有趣的是，在原住民觀光成果展的場合中，原本沒有販售茶

葉的其他族人，也以推廣觀光的名義協助推銷梨山茶。因此，原住民的茶葉在文化觀光的場合被接受，同時也成為展售會的焦點之一。



在接待一組外國客人後，喬伊姊興沖沖地說：「我們部落有很棒的工藝師，下次我們可以在茶罐上綁上我們泰雅的編織」。在原住民文化觀光的場合中，喬伊姊試圖的以文化包裝提升茶葉的能見度，希望藉由多方嘗試與市場接軌。接軌的同時也呈現了原住民性在特定的空間中的浮現，然而，在呈現原住民性的過程中存在著國家、觀光客對原住民的印象，以及原住民在自我身分與身體上存在著矛盾。

在特定的空間中，必須將自己歸類到某一群體，才能在特定的空間中具有行動的正當性，然而，當場景切換到國際型的大茶展時，用以標示原住民象徵性的物件，反而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2.大型茶展

在一般的茶葉展售場合，只要在茶葉比賽獲得頭等或是特等獎的都會在攤位最醒目的地方掛上招牌，假若沒有得獎，茶農也會強調無毒栽培，並附上相關檢驗證明，為茶葉的安全把關，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是最典型的例子。由於南投為台灣原鄉茶葉的重鎮，因此，在展售會場不免俗地會看到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在茶展上販售茶葉，而有別於其他平地人。環顧整個茶展，原住民茶攤位大多沒有獲獎，為了與其他平地茶家的商品作出區隔，身分表述便是一種茶葉行銷的手段。

但是，同樣的手法不一定在其他的展售場合適用，這點從我在台北食品展以及台灣百大農特產精品展的田野經驗中得到深刻的反省。當前陣子的食安風波之

後，市場上開始吹起無毒、有機的號角，為此，食品展上各家業者除了不斷的秀出產銷履歷的認證之外，展場內還特別規劃了食物安全學習專區。



因此，有別於先前在原住民觀光成果展上，不斷的強調將原住民的傳統元素附加在商品上，在大型的展場上，受制於市場的需求，以及農產品在台灣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的問題，喬伊姊改變以往的思維，「是不是原住民的茶不是重點」，她認為真正重要的茶葉的品質。

在 2016 年的台北食品展中，展場內部配置和去年有做了一些調整，台灣區的展場另外隔出了 TGA 專區，以強調台灣特色農產。對食物安全的重視在連續兩屆食品展的會場中顯而易見，喬伊姊的茶和其他的茶家一樣，皆認為無毒、有產銷履歷認證的茶葉才是消費者關切的重點。在此次的展覽中，沒有出現傳統服飾、圖騰或是手工的織布，取而代之的是在 TGA 的輔導計畫下，由行銷公司一手包辦攤位整體的視覺意象，其中包含了產品包裝、空間規劃、文宣、美編。在會展期間，廣告公司另外派出幾位設計部門的員工到場幫忙，藉由協助業者賣茶，測試消費者對於產品意象的觀感。

在喬伊姊主動的邀請下，我也加入賣茶的行列，提供我觀摩賣茶的機會。展場中的消費者類型多元，有些是跟喬伊姊合作的產銷認證單位，有些因高山茶慕名而來，更多的是被產品包裝吸引而來的過路客。大部分的消費者起初被攤位的視覺意象吸引，在攤位停留片刻，順道品茶，接著便開啟了與茶相關的一系列對話。

對一個略知台灣高山茶的研究者來說，賣茶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尤其在大型展售會上，茶葉銷售的手法關乎了商家的聲譽和業績，不過為了要更清楚的掌握

消費者對原住民茶葉的看法，憑著多次上山走訪茶園和練習品茶的經驗，我決定放手一搏。按照資深員工的說法，「話不多說，先喝再說」是最基本的第一步，茶的好壞藉由茶湯滋味和色澤而定，懂茶的人會進一步的提出產品相關的問題，或是他們在展場逛了兩圈之後，會繞回攤位買茶。相關的問題多與食安議題相關，消費者大多「先質疑用藥安全，再質疑產地真假」，例如，有客人會一看到高山茶，就會要求查閱相關的認證資料，包含產銷履歷驗證或是農藥檢驗等。

另外，由於在台灣茶葉市場中，大禹嶺高山茶的名氣甚高，卻常遭到混充的情形，有喝茶習慣的消費者就會開始質疑產地的真實性，消費者會提出「這是哪來的梨山茶？這個是真的茶嗎？」等疑問，我客氣地回答「這是梨山新佳陽部落自產自銷的高山茶」，但是消費者還是一臉狐疑地望著我，這時喬伊姊自信的說「這是我種的！」，當下對方的態度則緩和了不少，並開始詢問喬伊姊有關新佳陽部落和高山茶的事情。在重視產品真實性的茶展上，身分的彰顯，比起「外人」的介紹更有說服力。

在展場待久了，資深的員工則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說茶園的故事」，而茶園的故事由誰說，也成了推廣茶葉的關鍵。每當有消費者問起包裝的事情，喬伊姊都會熱心的解釋包裝的由來和故事「這次有兩隻腳跟四隻腳系列，兩隻腳的有台灣黑熊、貓頭鷹、紅頭山雀是一般的梨山茶，另外水鹿是比較高等的烏龍茶，這些都是我們部落後面黑森林會出現的動物，還有分成獵人包裝禮盒……，藍色是Tiffiney 藍，當時設計師那時候看到下過雨後的天空，就是這個顏色；褐色的制服和外殼的包裝則是大地顏色，黑森林的故事還沒串起來，黑森林要用什麼顏色，可能要請你幫忙想一下了」（如圖6）。



圖 6 2015 台北食品展原住民高山茶攤位的展示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2015/06/30）

有別於在原住民觀光成果展所見的圖騰包裝，食品展售會上轉而以視覺強化自然、生態意象的包裝，企圖引起消費者對茶葉的興趣。設計背後的意涵看似指涉了茶園自然、生態的意象，其進一步的連結了原住民性。參展合作的廠商向喬伊姊表示「很少看到有人會把產品和包裝結合得這麼完整，而且這是原住民的商品」，這點讓他感到驚喜。喬伊姊也回應的說其實茶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是她希望可以藉由良好的茶園管理和製茶技術，帶動部落的經濟和文化。因此，對她而言，永續經營的生態茶園是必要的手段，這點回應了其對土地的關愛。

此外，喬伊姊對茶葉的品質也有異於其他茶農的見解。尤其當台灣茶不斷的受到進口茶的打壓，以及食安議題，喬伊姊更反省做出好茶的同時也保護環境的重要。慶幸的是目前管理的茶園是自家的土地，面積並不大，所以可以用心的經營茶園，將茶的品質控制在最好的狀態。喬伊姊常說：

大部分的茶農會去迎合消費者的喜好做出特定的口味，例如紅茶，很多人說要有小綠葉蟬叮咬過後作出來的茶才好喝，然而，真正的茶應該要順應茶的本性，讓茶可以順應其本性，製茶師才能做出茶的味道。僅管台灣高山

茶在除了不同的茶區，有不同的茶的味道外，重點是要有自己茶的特色，而不是為了迎合大眾喜歡高山茶清香味就做清香。（田野筆記，2016.07.25）

原住民特色看似沒有實質的加分，也沒有在銷售的過程中被強調或是提及，但是最終，喬伊姊透過茶園管理的實踐，撐起產品特色。如果沒有獨天的高山環境，以及對土地和家的熱愛，很難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論述。因此，原住民性一直存在，但有時隱而不見或是已經在潛意識中融入了產品本身。

在不同的展場空間中，原住民性會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出來，比如台北的農產品展主要目的是賣茶，以及認識新的客戶，拓廣人脈以和營收，因此茶葉的品質、管理方式和認證便成了重點。換句話說，原住民性的展現不一定要透過穿原住民服裝，或是原住民的表演才表示有所謂的原住民性存在，將關於土地、家鄉的特色和品牌包裝內化的商品，也是一種原住民的展現，不是透過人去展演，而是透過茶去訴說他們的故事。

茶展上的擺設、人物的對話不斷強調生產與銷售之間的緊密，原民性地浮現同時連結在地實踐以及茶作為國家重要的特色農產的象徵。同樣的接合型態，也發生在梨山茶產地認證會議中。

梨山茶產地認證與地方產業劃界的過程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地方產業如何藉由確立梨山茶的產地生產標章的行為，進一步的對其他茶區產生排他效應？在相關的新聞報導中，時常出現梨山茶被不肖業者仿冒，或是被拿來與越南茶和平地茶混充的消息，因而影響梨山茶農的生計。儘管和平區農會曾經申請「梨山茶」的商標和防偽標籤，但還是無法有效地推廣梨山茶（田野筆記，2014.11.17）。直到現在，台灣的高山茶正面臨新的衝

擊，這個衝擊不僅是對茶農和地區性的茶產業造成影響，同時在主流論述的報導中，呈現出對於本土茶葉的焦慮。因此，重新界定地方茶葉的品牌和品質，便是地方農政單位和茶農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梨山茶的界定

梨山茶產地認證的推動，即是一項地方產業的保護政策。由於梨山茶的名聲較大，位於梨山附近的山系時常借用梨山茶的商標賣茶，例如：位於南投的華岡、碧綠溪一帶的茶有時也會被稱作梨山茶。由於梨山茶在廣義上的指稱範圍過於模糊、廣泛，在梨山茶產地標章的推動過程中，與地方上的茶農產生利益上磨擦，再者過去的區公所和農會的權責不分，造成推動工作的延宕（田野筆記，2016.07.26）。

在民國 105 年，梨山茶產地認證開始生效，同時也加強了地方和食物的連結。為了保護在地的梨山茶產業，梨山茶產地認證標章對部分的「梨山茶」生產者產生了排除效應，另一方面，也更有利於梨山茶在國際市場的推廣。地方產業的保護行動，同時也更鞏固了「本土」茶葉的市場。然而，當主流論述主張支持本土的同時，卻忽略了台灣茶的「本土」性是建立在梨山茶區的原漢合作關係中，也就是第四章所提到當原住民因為面臨經濟的邊緣，為了延續土地的使用，或是為了發展茶產業所發展出原住民提供土地，漢人提供技術和資金的關係，以及在茶園的經營過程中所產生土地做為家，或商品的矛盾。

原住民在茶產業的掙扎不只停留在地方，從茶園管理、包裝、展售的環節上，茶農們試圖要展現出屬於原住民的茶葉。當同一茶區都有產銷證明，茶葉品質競爭激烈的同時，經營茶園的理念，以及在理念背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成為了行銷的賣點之一。藉由茶產業的競爭，茶農們互相地以茶來劃界，在相互區隔的同

時，原住民則透過茶產業的發展得到更多的關注。這點可以從梨山茶道文化協會的推廣活動中，找出一些端倪。



對不暗買茶技巧的消費者而言，買到混茶或是假茶對消費者或是梨山茶農都是一項損失，因此為了推廣梨山茶，梨山地區幾戶原漢茶農共同組成梨山茶道合作社。每到梨山舉辦大型的觀光活動時，茶道合作社的成員時常受邀到梨山賓館或是福壽山農場等地進行茶道展演。為了達到視覺的整體感，展演的形式大多是身穿唐山的中國風。然而，當社員各自的茶業通路開始穩定，再加上梨山茶產地認證過之後，因為梨山茶獲得更多的保障，也讓茶農們更有能力對外發展茶產業，彼此之間會作出區隔，這些區隔也反映出其身分的彰顯。例如，在梨山茶產地認證標章的記者會上，有別於以往中國風，茶席的現場另外呈現了禪風、原民風和時尚風格，並各自展現不同的茶道體驗²²。

在此，在梨山茶強調本土、純正的同時，原住民以傳統的意象搭配茶席的展演賣茶，並不單只是要展現其特色而已，原住民性的再現除了要展現其特色之外，同時也反映在高山農發展脈絡下，高度資本化的部落在面臨土地流失狀況所作出的抵抗。當梨山茶逐漸被地方政府視為重要的特產之後，誰有權可以代言梨山茶？梨山人如何想？關於原住民文化再現策略的抵抗意涵，下段將有新的案例說明。

梨山茶產地認證說明會

²² 茶道展演記者會（2016.11.28）。（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68924&ctNode=1381&mp=119010>）。



圖 7 市長在梨山茶產地認證記者會與梨山茶農、泰雅族人合影

圖片來源：台中市政府（2016.11.26）

2016 年秋末，台中市長尋訪和平區的農政情形，其中一站便是到古邁茶園為梨山茶產地做行銷（如圖 7）。在新聞畫面中，台中市長和居民皆穿戴改良過的傳統服飾，在茶園旁載歌載舞。讓我感到訝異的是，自我第一次踏入田野時，我從未見過那麼多的部落居民，畫面中的居民有些是長居在部落內的族人，有些則是其他部落的族人。舞畢，眾人欣喜地吆喝市長，「市長來體驗我們原住民的採茶」。接下來，市長與部落的居民和區代表等人，一同前往茶園中示範採茶。畫面中，市長手中挽著竹籃，走在還未成熟的茶園裡練習採茶，再採摘過程中市長順手捻起茶葉，咬了一片葉子，讚嘆茶葉自然甘甜的口感。新聞中原住民將茶葉包裝成傳統的畫面和真實的田野狀況的反差讓我感到困惑，事後，我再度地上山詢問喬伊姊對梨山茶產地認證的活動的過程。

梨山茶產地標章的認證會議的目的除了正式宣布產地標章生效外，另一項重點是希望藉由市長的名義行銷地方產業。由於這次的認證記者會是由區公所承辦，在公開招標的流程中，喬伊姊的茶園在廣告公司的協助下，成功地通過提案，成為會議的場地。為了讓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喬伊姊請部落工藝師特別編製訂做

的籃子，作為市長當天採茶專用的竹籃子，有趣的是部落的族人看到竹籃時，看不出竹籃子是用來採茶的。換句話說，藉由對外活動所創造出來的「採茶籃子」並沒不存在於社會文化脈絡中，籃子和採茶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物品。



另外，為了呈現出熱鬧的氣氛，所以找來部落的人身穿傳統服飾配合唱跳，並尋求部落婦女們協助風味餐的籌備。同樣的手法，也在眾多官員尋訪梨山觀光、產業輔導成果時常見。一方面展演出部落產業興榮的一面，另一方面，要官員們注意到原住民的存在，以了解他們在產業發展上面臨的困境。最後，藉由媒體的力量，再現其原住民性。關於這點，喬伊和族人們深知這一切都刻意安排的。

與第三章所提及高山農業的發展背景，除了觀光產業外，原漢之間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刻意強調彼此的身分。但在國家尺度面上，可以察覺到原住民的身分被刻意凸顯了，表現在服裝、器具和強調在地性等面向。很顯然地，國家所認知的原住民和真實生活的原住民的認知，是存在著落差的。而梨山茶的產地認證所強調的在地，一方面接合了「原鄉」茶業，實則為一種混和性認同，同時也為當地的原住民茶農帶來發展的機會。

上述提到的案例在表面上看似順利地與市場接軌，實際上個人的社會位置在部落中存在著幽微、曖昧的掙扎。以喬伊姐為例，由於其為原住民二代，在部落中的社會地位較低，經濟能力較高。當喬伊姐茶產業逐漸受到矚目，經營的收益成長，又要回應部落的傳統時，也產生了個人在部落社會位置中的矛盾。儘管個人的社會位置和經濟狀況與部落集體社會的狀況產生落差，但基於對家的堅持，喬伊姐和其他部落的二代青年認為，藉由茶產業的發展，有機會帶動部落經濟的發展，藉由將個人的經濟利基擴散到全部落的願景，喬伊姐也會邀請部落的族人支援茶產業的生產和推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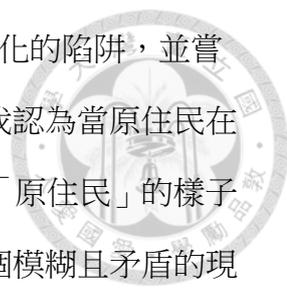
第三節 「原」來不簡單：對外與對內的矛盾

本章對於原住民在茶展上的再現，或是在梨山茶葉認證的場合中，不難發現原住民性在不同的位置，偶發地接合了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比較本土、自然、傳統的想像。然而，這些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非固定不變，其在市場機制強調本土的論述中實為一組偶然地裝配。儘管接合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權力關係，但是接合理論也有其限制，其較沒辦法處理不同層次的複雜性。因此，我嘗試以跨地域裝配（translocal assemblage）搭配接合的概念，以說明我在不同的場合中觀察到種種弔詭的現象。

正如同近年來的茶葉食安議題，以及國人對於本土茶葉的需求，在大型的展場中，代表台灣特產的高山茶與國家－本土－原住民接合的結果，使得原住民所生產的茶在行銷的論述與包裝上成為會場的焦點。

除了在市中心舉辦國際茶展的場合，藉由空間的陳設再現高山的意象外，為了能夠將具有本土性的高山茶，推展到國外茶葉市場，看似與自然共生的原住民茶葉圖像的包裝，實為原漢合作下刻意設計的象徵。在原住民觀光的場合，必須配合主辦單位的要求，穿上傳統服飾以符合光觀光客的想像，而忽略個人主體性的矛盾。場景轉到高山部落中，原住民為了接待市長尋訪茶園的行程，特別創造出原住民專門採茶的籃子，反而沒有被族人接受。

在上述的例子中，展現了原住民對於認同的展演，以及原住民性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接合。然而，接合的過程存在著矛盾，這股看似矛盾、掙扎的現在不僅反映在喬伊姐在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反映在高山茶產業較自然、傳統的矛盾，同時也反映了台為對於「本土」思維的矛盾。



Yeh& Bryan (2015) 提醒我們盡量避面落入將原住民本質化的陷阱，並嘗試以動態的關係理解原住民性。根據上述所提及的分析架構，我認為當原住民在不同的場合中，策略性地運用傳統、自然的元素，對外展演出「原住民」的樣子時，實際上其所呈現的「原住民」、「自然」、「傳統」為一個模糊且矛盾的現象，而此一矛盾的現象反映在國家、地方與個人尺度之間，其同時也代表了對於身分的自我認同、國家認同之間的焦慮。

第六章 結論

最後一次的田野是 2016 年底在松菸文創園區舉行的原住民觀光成果發表會。每次到梨山的攤位都會讓我聯想到山上的種種，尤其是從海拔 2000 多公尺的深山，轉換到台北市中心的高級消費區，空間上的反差讓人產生錯覺，但田野中所結識報導者們依舊熱情相待。剛從印度大吉嶺回國的喬伊姊和我分享她在印度學做紅茶的見聞，並順道一提年底會到台北新光三越聖誕擺攤的訊息。接著，下一步的計畫是正式開辦她計畫已久的茶園體驗營、到台北市中心的商場拓展茶葉通路。此外，在我離開田野之後，部落裡開始有其他的二代泰雅茶農加入了種茶的行列。

在另一方面，在仁愛茶區的虎哥一行人，則是秉持著當初入茶產業的熱情，轉型走「自然」、「傳統」的路線，以部落的圖騰作為茶區品牌的符號，和老一輩的族人們拉拔著部落青年持續努力著。不論在梨山的新佳陽，或是南投的仁愛鄉，高山地區的茶產業生計在國家、部落社會和產銷的市場間不斷的進行著。一切的一切在兩年多的田野經驗中，變動得如此快速。

每當報導者問我：「你要研究的主題是茶葉的種植嗎？還是你是記者要來採訪我們的茶？」老實說，我並非茶葉專家，也並非因為他們是「原住民」所以才

深入研究，而是看到高山農業人們的努力而被打動，最重要的契機是第一次田野時在山上初見重要報導人時的際遇，讓我有機會了解到深山裡有一群人，他們正嘗試以有別於傳統的生活方式種茶，藉由茶葉的生產讓自己被看見。



本研究以原住民和高山茶產業的關係，重新理解原住民性的概念。有別於將原住民性視為特定空間中的特定的群體，本文採借 Radcliffe (2015) 將原住民性視為一個分析的概念，以理解接合在新自由主義下位於邊緣地區原住民的掙扎。我主要聚焦在三個面向的討論，其一，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中，原本不屬於原住民傳統作物的茶，成為部落主要的經濟作物背後所隱藏國家對於原住民觀點。其二，以轉作茶葉為背景，討論原漢居民在茶葉產銷互動的日常，以及在部落中複雜社會關係的模糊地帶。其三，在茶產業政策轉型，提倡茶葉食安認證，以及原住民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原住民茶葉產銷論述在不同空間尺度的展演與接合的矛盾。

原住民性是一個動態且跨地方的概念，如同 Castree (2004) 提到原住民主義並不是一個純粹為了抵抗而產生的行動，他認為地方上的抵抗並不是全然的停留在地方，為了回應外界，地方的抵抗同時是在地和全球的行動。Baird (2015) 延續 Castree 的見解，進一步地將原住民性視為一個多元的轉型，他引用跨地方裝配的理論，並更有彈性地對原住民性的浮現提出解釋。

正如題目「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我想說的是「原鄉」並不如想像中的單一；而高山茶和原住民的關係在當今的對於食安議題、環境保護的解讀中，逐漸的被市場重視與接受的過程，並沒有想像中的自然、生態。在此，我認為原住民透過產茶、賣茶的接合過程中充滿著變動性與抵抗的醞釀。然而，接合也不是由單一面向所牽動的結果。

也就是說，原住民性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其為一個不斷劃界、變動的過程，且在劃界與變動的過程中，權力與結構運作的複雜性，並不能直接用接合的概念就可以輕易理解的。因此，我嘗試借用跨地方裝配，以及接合的概念作為輔助，以說明原住民在高山農葉的茶產業實踐的複雜性。

由「茶」產業接合的二元關係

高山農業發展的政策以及 1980 年代台灣茶產業市場的轉為內銷的政策下，茶葉轉變成原鄉主要的經濟作物之一。茶雖然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在政治經濟的過程中，茶產業的傳入加深了山地與平地的連結，以及原住民與高山茶的關係。當台灣風行高山茶的同時，開啟高山地區了新一波產業轉型的風潮。

然而，在通往現代發展的過程中，新佳陽部落面臨發展的兩難。例如，新型的經濟作物的引進，為部落經濟帶來新的契機，高山茶園地景更成為了部落觀光和梨山茶行銷賣點。但是，新產業的變遷，也隱含著土地利用的衝突與部落凝聚力消退的危機。這也是為什麼在部落陸續有二代的泰雅青年嘗試轉作他們不慣熟悉的茶樹，並嘗試以原住民文化作為包裝進行品牌行銷的原因之一。在社會關係方面，原本同屬於部落裡的二代青年，因轉作茶葉累積資本和名氣，與部落階級產生社會上和資本上的落差。

類似矛盾且複雜的現象也浮現在原住民在茶產業的生產實踐面。在食安事件發生後，茶葉市場轉向無毒、自然的需求時，影響了原住民在高山茶生產實踐的過程，同時也產生有利於原住民生產茶葉的機會，得以讓原住民生產的茶可以與主流的茶葉市場接合，創造茶葉的市場價值。然而，實際上原住民茶農對於茶葉自然、生態的論述是一個國家對「生態農法」的知識技術與在地原住民「傳統知識」混雜的結果，同時也顯現了在回應茶葉市場的過程中，交會了跨尺度作用力。

國家與市場機制運作下的原住民性浮現

在梨山，原住民與漢人的日常互動中，通常不太會強調彼此的身分，但當原住民性在不同的展售場合中，原住民性以不同的形式浮現。而原住民性浮現的形式也代表者國家如何看待原住民的隱喻。例如：在原住民觀光成果發表會上，原住民和非原住民被主辦單位要求穿上傳統服飾，並在會場中展現原住民的樣子，但對於平日沒有穿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而言，被要求穿上傳統服飾是一個困惑卻又可以接受的過程。

此外，在強調台灣本土的農特產時，原住民挪用其自身的傳統元素與非傳統作物的茶結合，以呈現茶葉自然、本土的意象，然而此一意象實際上除了混雜了傳統與非傳統之外，同時也是原漢合作下與茶葉市場接合的結果。

行文至此，那麼接下來要回答的是在不同的空間中接合、裝配的運作機制，以及其意義為何？上述提及的各種矛盾在國家強調本土的意識和市場作用下被合理化。不論是在產業轉型的過程、產茶與賣茶，所有看似隨著市場應變的過程，隱含著族群認同、自然、土地的矛盾，以及對本土的焦慮。同樣地，原住民性在不同的場合和空間中，不同元素在市場機制中的接合與裝配，並在接合的過程中偶然會產生矛盾的情形，這也是為什麼原住民會不斷地挪用與自然、傳統相關的元素附加在茶葉商品中，使其在再現的意義上變得更貼近「原住民」。

因此，根據上述的分析，我認為原住民性是一個動態的循環過程，在不斷的连接與裝配過程中，表面上看似強化了原漢關係之間的分化；然而，實際在運作的過程中卻是充滿模糊與矛盾。但也由於在多重尺度運作下的矛盾，使得原住民性在跨地方裝配的连接過程中，得以在不同的場合中偶然地浮現。



若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性變動背後的運作機制，我認為原住民性變動與浮現某種程度來自於台灣對於本土性的焦慮。這股焦慮反應在市場以及台灣對原住民性的理解，而這也是為什麼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台灣社會中，有少部分的原住民運用其身分位置在市場上嶄露頭角，其同時也凸顯了原住民位於社會邊緣的抵抗。然而，絕大部分的原住民在其身分和位置上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也因為如此，他們持續地透過市場經濟的運作接合相同/相異元素的過程中尋找新的利基，換句話說，本文所論及的原住民性和矛盾實為一體兩面。

每次回到都市之後，又會讓我懷念起在山上的田野生活。近來，部落裡的開始有其他原住民加入種茶的行列，而古邁茶園也和社區合作逐漸拓展新的經營方式，使得原本平靜的部落又增添了熱鬧感。平常在部落我只會用簡單招呼語，若能克服語言上的障礙，或許會有更精彩的故事值得期待。

從梨山往南投方向也有其他的原鄉部落發展茶產業，其經營的型態與新佳陽部落不同（有社會企業支持，也有平地有機企業進駐），若要持續追蹤原住民和茶葉的關係，可以往社會文化方面持續探究，或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觀點。

再次回想我第一次冬天從田野中，最常聽到讓人手足無措的對話：「錢都被漢人賺走了，你可以想辦法幫我們賣茶、賣水果嗎？」我想，在研究過程中，讓我深感困惑的環節透過對原住民性的重新思考，心中也逐漸明朗了。

引用文獻



中文文獻

- 王俊豪 (2013)。高山原住民部落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調適策略。 **台灣學會報**，
14 (5)，491-505。
- 王梅霞 (2014)。從 waya 看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一個賽德克部落的經濟變遷。 **考古人類學刊**，80，53-101。
- 瓦歷斯·諾幹，余光弘 (2002)。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朱長志 (1961)。臺灣山地之果樹。 **臺灣銀行季刊**，12 (4)，237-243。
- 余光弘 (1978)。梨山泰雅族人的經濟危機。 **中國論壇**，76，13-15。
- 余寶婷 (1997)。台灣茶園空間變遷之研究。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7，113-174。
- 官大偉 (2014)。空間秩序、地理再現與生態政治：臺灣山地資源利用／保育的歷史地理回顧。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7 (1)，159-197。
- 官大偉 (2006)。從「資源」、「地方」、「居所」：應該說一個由河流串起的泰雅故事。 **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1 (4)，14-23。
- 林育德，黃家祥 (2006)。文明的起源。台中縣霧峰鄉：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管理處。
- 范德光 (2004)。臺灣製茶工業五十年來的發展。臺北：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 紀駿傑 (1998)。從觀光原住民到原住民自主的觀光。發表於 [原住民文化與觀光休閒發展] 研討會，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 紀駿傑 (2005)。原住民研究與原漢關係-後殖民觀點之回顧。 **國家政策季刊**，4(3)，5-28。
- 洪廣冀 (2006)。林野利權的取用與控制、人群分類及族群：以蘭陽溪中上游地域為中心 (1890s-1930s)。許美智 (主編)，**族群文化——「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3-376 頁)。
- 吳淑娟 (2007)。戰後台灣茶業的發展與變遷 (碩士論文)。

- 
- 沈慈雅（2010）。**參山好茶道**。台中縣霧峰鄉：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管理處。
- 陳光興（1992）。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之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85-115。
- 陳茂泰（1973）。從旱田到果園-道澤與卡母界農業經濟變遷的調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1-33。
- 陳宇翔（2007）。從烏龍茶到高山茶：台灣茶壟斷租的社會建構。**台灣社會學刊**，**39**，107-157。
- 陳怡萱（2014）。從小米到高麗菜：以性別的觀點看比雅楠部落空間之變遷。（碩士論文）。
- 陳毅峰（2009）。原住民傳統知識體系及生態空間保護區策略。**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台灣：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
- 陳憲明（1984）。梨山霧社地區落葉果實與高冷地蔬菜栽培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曾寶慧（2015）。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景：台灣高山農業的政治生態學。（碩士論文）。
- 黃柏松（2007）。退輔會榮民安置與梨山地區農業發展（1956-1987）。（碩士論文）。
- 黃淑鈴（1998）。性別分工、家庭與勞動力市場再結構：南投高山茶區婦女採茶組織的個案研究。（碩士論文）。
- 黃應貴（1975）。光復後高山族的經濟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85-95。
- 黃應貴（1981）。東埔社土地制度之演變——一個臺灣中部布農族聚落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2**，115-149。
- 黃應貴（2004）。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物與物質文化**（379-448頁）。台北：中研院。
- 黃應貴（2005）。作物、經濟與社會：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廣西民族學院報**，

27 (6) , 13-27 。

溫慕蓀、林源欣 (1965) 。山地農牧局 54 年度山胞農業推廣教育計畫工作總報告。 *農業推廣文彙* , 10 , 212-218 。

劉佩琪 (2009) 。原住民族農地利用與部落發展之研究 - 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為例。(尚未發表)。

楊蕙禎 (2007) 。原漢的經濟表現與社會網絡：以東埔與草坪頭的茶作經營為例。(碩士論文)。

廖文生 (1984) 。台灣山地社會經濟結構性變遷之探討。(碩士論文)。

廖守臣 (1984) 。 *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

廖慶樑 (2010) 。 *台灣茶聖經* 。新北：揚智出版。

謝世忠 (1987) 。 *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 。台北：自立晚報。

顏愛靜、楊國柱 (2004) 。 *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 。新北：稻鄉出版。

英文文獻

Agrawal, A. & Sivaramakrishnan, K. (2000). *Agrarian Environments: Resources, Representations, and Rule in India*. London, England: Duke University.

Altamirano-Jiménez, I. (2013). *Indigenous encounters with neoliberalism: Plac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anada and Mexico*. UBC Press.

Baird, I. G. (2015). Translocal assemblag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os. *Political Geography*, 46, 54-64.

Baird, I. G. (2016). Indigeneity in Asia: an emerging but contested concept. *Asian Ethnicity*, 1-5.

Barker, C. (2003).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 
- Bryan, J. (2009). Where would we be without them ? Knowledge, space and power in indigenous politics. *Futures*, 41(1), 24-32.
- Castree, N. (2004). Differential geographies: place, indigenous rights and 'local' resources. *Political geography*, 2(32), 133-167.
- Coombes, B., Johnson, J. T., & Howitt, R. (2012). Indigenous geographies I Mere resource conflicts ? The complexities in Indigenous land and environmental claim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6), 810-821.
- Featherstone, D. (2011). On assemblage and articulation. *Area*, 43(2), 139-142.
-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Watts, M., & Whatmore, S. (Eds.). (2011).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 Hall, S. (1996).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Black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16-60.
- Hung, P. Y. (2013). Tea forest in the making: Tea produc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modernity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Geoforum*, 47, 178-188.
- Hung, P. Y. (2014). Frontiers as dilemma: the incompatible desires for tea produc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rea*, 46(4), 369-376.
- Hunt, S. (2014). Ontologies of indigeneity: The politics of embodying a concept. *Cultural Geographies*, 21(1), 27-32.
- Li, Tania Murray. (2000). Articulating Indigenous Identity in Indonesia: Resource Politics and the Tribal Slo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1), 149-179.
- Li, Tania Murray. (2010). Indigeneity, Capital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Dispossess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1(3), 385-414.
- McFarlane, C. (2009). Translocal assemblages: space,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Geoforum*, 40(4), 561-567.
- Merlan, F. (2009). Indigene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0(3), 303-333.

- 
- Moore, D. S. (2005).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c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p. 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Neumann, R. P. (2009). Political ecology: theorizing scal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3), 398.
- Radcliffe, S. A. (2015). Geography and indigeneity I: Indigeneity, coloniality and knowledg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10.
- Robbins, P. (2012).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Vol. 16). John Wiley & Sons.
- Tsing, A. L. (1999). Becoming a tribal elder and other green development fantasies. *Transforming the Indonesian uplands: Marginality, power and production*, 159-202.
- Wise, J. M. (2005). Assemblage.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pp. 77-87).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Writer, S. (2016). Relying on Heaven” Natural farming and “Eco-tea” in Taiwan. In Lewis, T. (Ed.). *Green Asia: Ecocultures,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Ethical Consumption*(pp. 51-65). Routledge.
- Yeh, Emily T.& Bryan, J. (2015).Indigeneity. In Perreault, T., Bridge, G., & McCarthy, J. (Eds.)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 (pp. 531-544). Routledge.